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論文

冷戰後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發展研究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指導教授：邱坤玄 博士

研究生：伍大衛 撰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摘要

傳統中國盛行儒家價值觀，故未具備形成中國民族主義的環境條件，直到近代受到西方列強侵略後，中國民族主義才逐漸興起，成為中國救亡圖存、抵抗外侮以及進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最大動力。隨著冷戰後中國國力進一步發展，中國人的自信明顯得到提升，加上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諸多遏制、打壓行為的不滿，不可避免地將進一步強化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成為當代中國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藉由探究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從中梳理民族主義對中國具有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並透由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2013 年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2014 年成立「孔子學院」等三個案例驗證，證明中共歷年在遭遇內外嚴峻挑戰下，多將中國民族主義視為政治工具，藉以轉移內部究責壓力，鞏固自身執政合法性。然而中國民族主義具備情緒化、不受控、不確定性的特質，對內加劇中共維穩壓力，對外引發國際反「中」情緒，均對中共內外治理造成嚴重挑戰。

結論認為中共為避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失控引發社會動盪，相關涉及主權的重大事件均會適時參與和隨時監控，確保相關事件發展朝向中共有利的方向，而非失控超出底線，因此中國民族主義能發揮對內穩定調節功能，並不如西方學界所稱將激發內部激進情緒，進而顛覆中共政權甚至影響西方各國，未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將走適應中國國情的道路，持續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更新內容，卻又盡在中共掌握中，形成一種官民間的特殊默契。

關鍵字：中國民族主義、鞏固政權合法性、情緒化、對內穩定調節功能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檢閱	2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0
第五節 研究架構	11
第貳章 民族主義的探討	13
第一節 民族主義的定義與意涵	13
第二節 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	18
第三節 中國民族主義的功能	28
第四節 小結	37
第參章 中國民族主義的功能驗證	39
第一節 鞏固政權合法性	39
第二節 維護社會穩定	48
第三節 建構大國形象	56
第四節 小結	63
第肆章 中國民族主義的機遇與挑戰	65
第一節 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	65
第二節 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對中共治理的挑戰	71
第三節 臺灣問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77
第四節 小結	82
第伍章 結論	8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5
第二節 研究建議	88
參考文獻	89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017年7月27日《戰狼2》在中國上映，該片尾描述男主角站在卡車上，手拿著五星旗欲通過非洲戰火區，兩旁正在交火的武裝分子看到後，立刻大喊著：「是中國人！停止射擊」，紛紛讓出道路使男主角一行人能平安通過，隨後畫面轉到中國的護照上，秀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等字眼，除展現出中國國力的強大與自信，亦凸顯「民族主義」已是當代中國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年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已引起學界和社會不少討論及反應，相關研究更是繁不及備載。目前較為主流接受的觀點，是認為中共在經歷1978年改革開放、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及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事件後，其原本仰賴的共產主義及毛澤東思想已不再具有說服力，故中共自1994年出臺《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欲以民族主義(中共稱為愛國主義)來重新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並鞏固其政權合法性。

其次，反西方仇外心態亦是促使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原因。回溯歷史，19世紀中葉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挾帶船堅炮利的優勢大舉侵略中國，由於滿清政府及民初北洋軍閥政府均無法有效應處，引發了中國民間不滿情緒，進而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其「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民族主義口號凸顯出中國人民渴望「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心態，爾後也成為國民黨政府北伐勝利及中共成功奪取政權的重要力量。

綜上所述，民族主義已成為當代中國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觀察坊間文獻參考資料針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發展過程與作用眾說紛紜、龐雜細瑣，若能深入研究相關課題相信能更加瞭解中國發展脈絡，引發筆者的研究興趣。

二、研究目的

民族主義能有效團結內部共同為宣揚國家光榮而努力，民族中成員甚至願意犧牲小我達成目的，然而此忠於國家的心理狀態，卻也可能造成國家動盪、分裂，對國家而言既是「福音」又是「禍水」¹。此雙面刃的性質，對當前中共治理而言是個難解、矛盾的問題，一來隨著中國國力整體提升，中國人的自信明顯得到提升，中國民族主義亦逐漸高漲，在面對西方國家一再遏制中國崛起的種種打壓作為下，中國人即使深受中共嚴控社會輿論的限制，仍常常透過遊街抗爭、發起拒買抵制運動、在網路空間發表激烈愛國言論等方式，要求中共對外採取強硬態度以彰顯國力，造成中共向來採取相對保守的外交政策的壓力，二則是中共雖透過改革開放取得經濟成果，卻也造成民眾對過往共產主義的質疑，同時當前中國亦面臨失業、高房價、貧富差距等諸多社會問題，均足以構成對中共政權的挑戰，故中共被迫運用民族主義來鞏固自身執政合法性。本文希望達成的目的有以下：

- (一) 瞭解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作為研究的基礎背景。
- (二) 探討中國民族主義對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作用，並藉由案例的引述，能更加知悉其關聯性。
- (三) 瞭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機遇與挑戰，作為對我研究中國發展的啟示。

最後，藉由所有的討論與分析，期能以更全面的觀點與視角，進一步瞭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全貌，以豐富其相關研究，並能對當前兩岸關係帶來啟示。

第二節 文獻檢閱

透過回顧整理中國民族主義相關文獻，將其進一步歸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背景」以及「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狀況」兩種觀察點，以下將分別說明。

¹ 洪泉湖，「民族主義基本概念的解釋」，*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1995年），頁3~6。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背景

傳統中國受儒家文化教育以及大一統的價值觀影響，並不具備形成中國民族主義的條件，直到近代中國遭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後，才逐漸形成中國民族主義，成為中國後續推動救亡存圖、尋求富強等系列國家建設的主要動力，以下分別加以探討：

(一)傳統中國遵循文化主義、大一統價值觀並無民族主義概念

張灝認為民族主義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產物，是中國人在 1895 年以後對當時產生的政治與文化危機的回應，並非中國傳統的產物，然而它的形成依然受到傳統積澱的影響，尤其是傳統漢族的族群中心意識，頗有一種「同文同種」的意識與感覺²，意即中國民族主義雖為近代興起，卻仍帶有部分傳統色彩。

葛兆光指出中國宋代以來，接連受到北方遼國、西夏、金國、蒙古等異族政權的嚴重威脅，打破了唐代以來漢族中國人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傳統觀念與想像，真正有了實際的敵國意識、邊界意識以及有限空間意識，對此，中國菁英份子持續試圖證明中國的正統性與漢民族文化的合理性，而這種觀念就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³，影響至今。

鄭永年指出傳統中國奉行文化主義，認為中國文化是世上最優越也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只要其他民族願意接受中國文化，即儒家思想，就可以合法統治中國，簡言之，國家忠誠是對儒家文化，而非某一政體或民族，至於物質財富方面則較不注重。之所以有這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主要是傳統中國並無面臨太大外來壓力，故沒有形成民族主義的概念，以及政治家必須學習儒家教育，並根據其原則治理國家，直到近代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後，中國才放棄原有文化主義而轉向為民族主義⁴，可說是中國受到外力刺激後，其民族主義才逐漸興起。

²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愛思想**，2017 年 3 月 26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749-2.html>。

³ 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哲**，第 1 期（2004 年），頁 10~12。

⁴ 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71~372。

金觀濤則稱上述中國文化主義為「華夏中心主義」，由於中國文化與制度被中華民族視為最優秀的制度文化，故可作為民族認同符號，然而中國一旦走向衰弱後，華夏中心主義將無法再作為民族認同符號，被迫變成極端封閉排外，以閉關自守方式維護自身優越性，甚至走向解體的結局⁵，意即中國民族主義之興起與中國國力強弱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周建明認為中國地理環境塑造了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民族生存環境，同時形成各地方的間緊密的聯繫與強向心力，最終逐漸形成大一統的民族生存型態，此中國認同的民族傳統不可違背，絕不能接受分裂，這可從中國歷史上為何在短期分裂後，必然又能迅速大一統中國得到證明，近代中國人受到西方列強欺侮後，基於大一統的中國認同價值觀，很快就上升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並形成民族主義⁶，期能最大程度團結內部以抗衡外敵。

(二)西方勢力侵略進而形成中國民族主義

金沖及指出中國自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以來，長期遭受西方列強的壓迫與欺凌，更被西方國家戲稱為「劣等民族」，可以說亡國滅種的噩運似乎都會隨時降臨到中國人頭上。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在這樣的大變局下，首度提出「振興中華」這個激勵人心的口號，代表著中國人共同的願望與心聲，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生存，已成為擺在中國人面前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遂應運而生⁷，影響至今。

陳方正認為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逐漸發展出民族主義，對中國的自立自強發揮重要功效，例如民初的北伐、廢除不平等條約、對日八年抗戰以及抗美援朝戰爭，均發揮持久和大規模群眾動員的作用，正是透過這些運動和戰爭，中國向世界證明它的確能凝聚民族力量，並且有伸張民族意志的決心和能力，故有權利

⁵ 金觀濤，「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演變」，**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頁 129~131。

⁶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92~393。

⁷ 金沖及，「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第 5 期(2001 年)，頁 1~2。

作為一個政治主體立足於現代世界⁸，且絕不能允許外國再度欺侮中國。

邵宗海指出晚清時期中國被迫向西方敞開大門，各類歐洲器物、人員、價值觀進入中國，大大影響以年輕人為主的價值觀，其中改變最大的莫過於以中國為大一統的「世界觀念」被打破，原有「天下觀」已不符合現實，年輕人驚覺中國僅是世界上眾多國家的一，與歐洲國家在經濟、軍事、政治上已存在巨大差距，深深體認到傳統天朝價值觀與顛預守舊的清朝政府已無法應處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於是展開系列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國等革命運動，中國民族主義遂逐漸發展起來⁹，期能救亡圖存，團結內部共同抗衡外敵。

吳國光認為 20 世紀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以尋求富強為基本動力。由於西方勢力相繼侵略中國，有志之士除了對清朝政府的無能感到不滿外，更視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為最大問題根源，其中五四運動最能代表要求變革的民族主義高潮，當時許多有志之士激烈批判中國政治制度，對現行政權合法性與傳統中國文化抱持完全否定態度，深深相信文化改造是中華民族再起的基本任務之一，是民族復興的唯一道路；可以說民初時期有志之士迫切呼喚的社會變革，都是為了中國的富強，體現出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懷¹⁰。李澤厚亦指出，民初時期救國的民族主義，是整個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首要主題¹¹，成為影響中國近代歷史乃至迄今發展之重要因素。

周建明指出上個世紀西方勢力大舉入侵中國後，讓中國自成一體的封閉體系被打破，在「以主權國家為特點的現代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國後，陸續興起追求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中國民族自決運動，而後促成辛亥革命進而建立中華民國；這同時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過程¹²。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之興起與外國刺

⁸ 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19 期(1993 年)，頁 28~29。

⁹ 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新北市：韋伯文化，2009 年)，頁 212~215。

¹⁰ 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18~329。

¹¹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308~309。

¹²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91~393。

激習習相關。

二、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狀況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迅速發展，中國人的民族信心與自尊心大幅上升，然而卻引發中國人對共產主義過去推動改革措施的質疑，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更加深中國人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質疑，對此，中共遂運用民族主義為號召，將其緊密地與中共政權聯繫在一起，用以填補其權力真空；另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為因應中國崛起而採取系列圍堵措施，反而引發中國民間強烈的反西方情緒，進而形成中國民族主義，以下分別加以探討：

(一) 中共用民族主義填補權力真空

張灝認為中國自 1895 年以來，傳統政治秩序開始動搖而崩潰，傳統文化思想的核心價值亦開始走向失落，中國自此陷入政治與文化危機。此時知識分子必須替自己的政治認同、群體的歸宿感與社會價值取向，重新尋找新的凝聚點，而民族主義就成為該等新的精神核心，中國民族主義遂應運而生¹³，意即中國民族主義是知識分子為尋求政治認同所形成之重要精神核心。

蕭功秦指出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共產意識形態作為國家與社會共同體的凝聚力功能逐漸淡出，且中國民眾開始關注本民族利益，民族主義作為國家與社會共同體的凝聚力的功能意義自然突顯出來，中國執政菁英乃順勢運用民族主義為號召，凝聚國家資源發展建設，進而鞏固其執政地位¹⁴，期能填補中共權力真空。

汪宏倫指出中國自歷經 1978 年改革開放、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後，共產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已難以再說服中國人支持中共政權，為填補其意識型態的真空、拯救合法性危機，中共遂積極提倡愛國主義，改將民族主義作為政權的主要合法性來源¹⁵，藉此填補中共權力真空，鞏固政權地位。

¹³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愛思想**，2017 年 3 月 26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749-2.html>。

¹⁴ 蕭功秦，「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與前景」，**戰略與管理**，第 2 期(1996 年)，頁 59~60。

¹⁵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第 19 期(2014 年)，頁 191~192。

林泉忠認為中共建政後的統治基礎源於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然而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毛澤東時代結束、改革開放以及六四天安門等事件後，中共「三信危機」（信仰、信心、信任）在中國社會迅速蔓延，加深中共統治的危機感，故被迫全面性強化愛國主義教育，期能透過「官方民族主義」操控社會輿論，達到服膺於中共政權的社會效果¹⁶，藉此更加鞏固政權合法性地位。

吳國光亦指出 1989 年天安門鎮壓以及 1991 年世界共產主義崩潰，使得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中共遂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措施的際，運用民族主義喚起中國人曾遭受西方列強欺侮而集聚的強烈排外意識，大力宣傳自身制度才是可以拯救中國人再度免遭外國人凌辱的民族利器，進而鞏固自身執政合法性¹⁷。簡言之，中共利用西方國家打壓之際，運用中國民族主義填補其權力真空，更加鞏固政權地位。

(二)中國民間對西方打壓的不滿進而形成民族主義

任丙強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力逐漸崛起，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極大提升與宣洩，然而此時卻與美國產生系列衝突事件，包括 1993 年「銀河號事件」、1999 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 年美中撞機等，中國民眾持續感受到美國的敵意與強加給中國的屈辱，自然與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聯繫起來，此等民族恥辱意識、民族痛楚與自豪感的交錯影響下，民族主義情緒已不可避免地重新點燃¹⁸，成為影響至今之重要思想潮。

宋強指出「遏制中國」已成為美國的長期戰略，只要美國遏制持續存在，中國就必須對美國進行一定的遏制才能在國際關係上掌握主動權，且必須仗義執言才能維護中國及其他弱小國家的根本利益，故反遏制將成為中國的長期戰略¹⁹，

¹⁶ 林泉忠，「中國民族主義的三階段論—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厲害了，我的國》」，明報月刊，第 53 卷第 9 期(2018 年)，頁 30-33。

¹⁷ 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悖論—歷史的發展與政治的錯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認同與全球化(香港：城市大學，2012 年)，頁 80-82。

¹⁸ 任丙強，「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原因、特徵及其影響」，學海，第 1 期(2004 年)，頁 78-79。

¹⁹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1996 年)，頁 61-65。

在此濃厚的反美情緒下，中國民族主義遂逐漸興起。

鄭永年指出 1990 年中國民族主義是對國際社會壓力的回應，當時西方根據自身發展經驗認定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紛紛提出「中國威脅」、「圍堵中國」等視中國為假想敵的論點，故相繼對中國進行打壓作為，此舉反而讓中國在 1980 年代向西方學習的社會氛圍驟變，民族主義式的批評西方(以美國為主)成為主流的知識風氣²⁰。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打壓之抗議。

同時鄭永年亦指出隨著中國越融入國際體系，開始不認同現存不利於中國發展的國際規則和規範，此舉在西方看來就是對現存體系的敵視，故給予中國相當大的國際壓力，而民族主義自然成為中國反抗外在壓力的精神武器，可以說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是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深刻反思²¹，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產生濃厚之反美情緒，影響至今。

蕭功秦則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反應型民族主義，在面對西方強力挑戰下，它不自覺地但持續性影響中國人的行為選擇，然而受到人多勢眾的「虛幻大國感」、將政治與軍事問題作為道德倫理的標準來判斷的「泛道德主義」、長期處於封閉環境下導致的「資訊同質性」等因素影響，往往做出不利於現實的理性思考，以偏執、好鬥的思維來應處國際問題²²，然而此舉或將更遭致外國打壓、遏止，形成惡性循環。

三、過往文獻所缺少的資訊

經蒐集檢視相關資料後，發現過往文獻主要針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背景進行探討，其共同結論多為傳統中國受儒家文化、大一統價值觀影響，並無形成民族主義的必要，直到晚清民初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後，在救亡圖存的壓力下逐

²⁰ 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 381~383。

²¹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 436~437。

²² 蕭功秦，「近代以來中國的高調民族主義」，*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認同與全球化*(香港：城市大學，2012年)，頁 64~67。

漸形成民族主義；另外當中共建政後，雖推出系列社會主義改革措施，然而成效不彰並無明顯改善人民生活，尤其又陸續經歷文革浩劫、改革開放、六四天安門事件、世界共產主義削弱等事件，中共被迫重新利用民族主義以鞏固執政地位，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採取多項打壓措施以遏止其崛起，引發中國人強烈的不滿，一改 80 年代親西方態度，轉為嚴厲批判西方，在此內外因素影響下，更加促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然而若要探究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尚仍缺乏以下資訊：

- (一) 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以作為研究的基礎背景。
- (二) 中國民族主義對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作用，以及相關案例的佐證。
- (三) 中國民族主義的機遇與挑戰，以作為研究中國發展的啟示。

本文認為如能進一步探討上該三項觀察點，將有助於釐清爭點，更加瞭解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全貌。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文採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透過整理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發展脈絡，瞭解中共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宣傳工具，達成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目標，俾利維持統治。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透過蒐集書籍、文章、期刊、論文、報章雜誌、新聞報導等文獻來提取所需資料，用以進行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²³，期能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理論的發展狀況、研究的具體方向、適當的研究設計方式及研究

²³ Ranjit Kumar 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Research Methodology: A step-by-step Guide for Beginners*）（臺北：學富文化，2000年），頁 129~130。

工具的使用方式，進而瞭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與推測未來²⁴。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主題的國內外書籍、文章、期刊、論文、報章雜誌、新聞報導等進行文獻分析及論點歸納，以瞭解過去研究者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議題的相關研究成果，並針對過去文獻中所缺乏的資料，繼續深入探討。

(二) 案例分析

冷戰後，中國人開始質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乃運用民族主義為號召，將其緊密地與中共政權聯繫在一起，用以填補其權力真空，並推動富有儒學傳統精神的民族主義作為凝聚社會向心力的重要工具，用以維護中國社會穩定，亦藉此向國際展現中國儒學文化優勢，有助於中共建構大國形象。因篇幅所限，不能全部進行探討，故本文選出其中三個案例作重點比較研究，分別為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2013 年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2014 年成立「孔子學院」等案例，本文有信心此三案例的挑選，能概覽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選擇冷戰後時期作為基本研究時間，是因為隨著蘇聯解體、中國實力崛起，「中國威脅論」開始甚囂塵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而對中國進行諸多遏止作為，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開始復興，因而爆發系列衝突事件。本文礙於篇幅限制，故僅選擇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2013 年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2014 年成立「孔子學院」等案例，本文有信心此三案例的挑選，能概覽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

²⁴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1999 年），頁 138~156。

二、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限制在於以下兩方面：首先，撰寫論文常需要大量的文獻資料與研究相關歷史事件及脈絡，進而從中歸納、分析、整理，以預測未來可能的趨勢發展，然而中共對於官方原始資料的公開有其侷限性，相關資料取得的困難度相當高，故資料蒐集難免不盡完備，至於較輕易取得的官方文件、中共領導人言論、中國學界評論、書刊、期刊等，時常充滿意識形態思維且缺乏透明度，難以查證真偽，可信度恐有欠佳的慮，因此，本文乃盡力透過相關圖書文獻、網路資料等竭力蒐集、整理、分析，以彌補其不足，盡量客觀呈現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全貌；其次，選擇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2013 年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2014 年成立「孔子學院」等作為觀察案例，一方面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卻可能因而造成觀察角度的侷限。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文分為五個章節，第二章主要探討民族主義的定義與意涵、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表現類型、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關係等，從中梳理民族主義對中國具有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以作為本文三、四章研究的歷史背景。

本文第三章主要利用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2013 年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2014 年成立「孔子學院」等案例，從中驗證中共運用民族主義是否有發揮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並據此綜合評析。

本文第四章主要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的機遇與挑戰，期能推測未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倘若持續高漲是否會對中共治理造成挑戰，甚至朝向極端民族主義發展，恐加劇區域緊張態勢；另分析臺灣問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探討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

最後一章是本文的總結，綜合上述的討論，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在中國鳥籠民

主的特殊國情下，能發揮對內穩定調節功能，並不如西方學界所稱將激發內部激進情緒，進而顛覆中共政權甚至影響西方各國，因此本文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將走適應中國國情的道路，持續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更新內容，卻又盡在中共掌握中，形成一種官民間的特殊默契。最後就中國民族主義對兩岸關係影響提出相關建議，期能對我政府兩岸政策帶來啟示。



第貳章 民族主義的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民族主義的定義與意涵、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表現類型、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關係等議題，以從中梳理中國民族主義對中共具有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以作為第三、四章研究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民族主義的定義與意涵

一、民族的意涵

欲分析民族主義，首先須對運用民族主義的主體對象「民族」做分析。翻閱世界上著名的詞典，可從中瞭解到對民族的解釋，例如：在 1976 年出版的英國《牛津詞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Six Edition, 1976)對於民族(nation)的解釋為：居住在特定領土範圍的內且接受政府管轄下的群眾，渠等在歷史、血統、語言等均具有相同特點；另外，在 1979 年出版的美國《麥克米倫詞典》(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 1979)則針對民族(nation)的界定為：(一)一群有著相同語言、歷史、起源的群眾；(二)具有部落或部落聯盟，特別是指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或部落聯盟；(三)一群有著共相同歷史、文化傳統、起源的民眾，渠等居住在被劃定的領土，並接受同一種政治制度的統治，另外也可視為在同一個國家的民眾所擁有的領土，意即國家、國土；從這二本美、英兩國出版的詞典的解釋來看，民族(nation)可界定為居住在一國領土範圍的內，接受一個政府和一種政治制度管轄下的大量民眾，意即地理意義上的國家(country)¹。

另外民族主要可從主觀方面、客觀方面作為 2 種截然不同的觀察角度：從主觀方面來解釋民族，世界上任何一個在特定地理區域的群體，其內部成員已經意識到己身為群體的重要組成份子，同時也期望能維持對該群體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民族就隨即產生了²。然而，若單從這主觀角度來界定民族，與我

¹ 翟勝德，「民族譯談」，*世界民族*，第 2 期(1999 年)，頁 67~68。

² 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歐洲研究*，第 5 期(1993 年)，頁 14~15。

們平常思維邏輯有所牴觸，例如假設有 2 個完全不同起源、語言、歷史的群體，按理在日常生活上應該鮮少交流，即使想深入交流也受制於先天出生背景的差異而難以交流，然而卻願意共同承認自己完全屬於同一個民族，從外人角度來看實在難以理解這 2 個群體能構成一個民族；另外即使在同一個民族下的兩個不同群體，因為特定原因而希望能獨立出來不願再接受同一個政府管轄，在這樣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從外人角度來看似乎也不能說他們 2 個群體不是同一個民族，因此，若單從主觀方面來界定民族，頗有不盡完善的處。

至於從客觀方面來解釋民族，它並非如主觀方面所認為的出於一種主觀期望，而是一個在源遠流長的歷史下所自然構成的，因此地理、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因素格外重要³。同時民族也是一個擁有著共同地域、語言、文化、經濟生活、心理素質穩定的共同體，這些因素若缺少任何一個，民族就不能成為民族、群眾的共同體⁴。然而，目前研究方法難以精準界定團體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例如一個宗教下往往有不同分支教派，其不同教派人士是否共同為同一宗教還是應視為不同宗教團體？因此，若單從客觀條件來界定民族似乎很清楚，然若細究下去則有諸多定義不明的處，故若單從客觀方面來界定民族，亦有不盡完善的處。

綜上所述，民族的內涵即為某群人由於地理、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而逐漸連結成一個團結的群體，其特質表現在客觀社會現實以及主觀意識與心理認同的交互影響中。

二、民族主義的意涵

(一)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

單就「民族主義」一詞來看，最先出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內的一場針對「波西米亞人」與「非波西米亞人」出生地(Nation)問題所進行的學術爭論中，當時某

³ 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歐洲研究*，第 5 期(1993 年)，頁 14~15。

⁴ 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史達林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61~64。

位教授為了捍衛同胞的共同利益，乃首次使用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另外這個詞首次出現在 1836 年的《英國牛津辭典》，同時亦出現在 1844 年的社會文本中，被定義為對一個民族的奉獻與忠誠，即認為己身民族比其他民族還要優越，對此必須持續促進、提升自身民族文化與民族利益，用以對抗其他民族文化與民族利益⁵。

目前各界對民族主義的起源尚無具體共識，但多數人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 18 世紀末的歐洲，那時歐洲盛行重商主義，由商人與銀行家所組成的商業階層逐漸興起，渠等為了達到保護己身資產、維護自由貿易以及結束貴族特權等目的，乃成為了推動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動力，之後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運動與美國獨立戰爭被視為民族主義歷史上的里程碑，其民族主義思想意識逐漸在歐洲、北美洲傳播開來，隨著德國、義大利等在 19 世紀 60 年代相繼統一成為新的民族國家後，民族主義浪潮在 19 世紀末逐漸從歐洲與北美洲擴展至亞洲、中南美洲，造就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諸多民族國家的興起⁶。

另外觀察這些新興民族國家，可發現其「異質」成分持續縮小，而「同質」成分逐漸增加，在這樣的轉變下，民眾慢慢瞭解到己身的共同特質，進而形成有共同認同對象的民族意識、政治意識，如此一旦這樣的民族主義誕生成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後，將能夠構建起更為統一與完整的民族國家，而過往的專制王朝國家則將難以統治⁷。

綜上所述，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可視為人類進步的發展史，一個當時民眾因不滿受專制王朝國家統治的現狀，而起身反抗進而建立民族國家的進步發展史，其對人類具有重要的貢獻，無怪乎前南韓總統金大中認為，民族主義是 20 世紀的最偉大成就之一⁸。

⁵ 胡滌非，「民族主義的概念及起源」，*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5 年)，頁 6~7。

⁶ 龐中英，「當代民族主義若干問題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6 期(1996 年)，頁 9~10。

⁷ 胡滌非，「民族主義的概念及起源」，*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5 年)，頁 8~9。

⁸ 金大中，*21 世紀的亞洲及其和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9~20。

(二) 民族主義的意涵

目前各界對民族主義的意涵眾說紛紜，由於本文主要針對中國民族主義作探討，故僅列舉多位具代表性的中國學者及部分臺灣學者的觀點來分析民族主義的意涵：

王緝思認為民族主義是指維護與擴大民族利益的概念，必須忠於民族，且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例如「經濟民族主義」主張積極擴大國家在海外的貿易市場，同時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希望能獲取國家最大經濟利益⁹，達成國富民強之目標。

李宏圖指出民族主義是內部每個成員為形成民族情感，乃利用文化與血緣，將己身與該民族連結在一起，在這樣的濃厚情感上，民族成員遂開始追求民族統一、獨立等利益，即使需要奉獻生命，但在懷抱對民族強烈的優越感上，也在所不惜¹⁰。簡言之，民族成員具備「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精神。

王聯分析民族主義的意涵可分為五項¹¹：1、民族主義是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與綱領，在近年因資本主義而逐漸興起的民族運動中，以及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運動中，民族主義均占有一定的重要角色；2、民族主義的意涵是多方面的，抽象上來說民族主義就是限制民族行動與生活的概念，至於具體來說就是指彰顯傳統、語言、歷史等民族精神的特定方式；3、民族主義是一種原則，這樣的原則認為人類自然而然地被劃分為民族，而且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態就是民族自我統治的政府，意即政府的單位和民族的單位必須保持一致性；4、民族主義是一種運動，更具體來說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運動，其主要產生原因是部分民眾為達成社會群體維持自治的目標，乃期望透過民族主義能夠形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5、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中，民眾展現了對民族國家的高度忠誠度。

王逸舟認為民族主義可以同時擁有多種不同的面貌，例如民族主義有時成

⁹ 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歐洲研究*，第5期(1993年)，頁17~18。

¹⁰ 李宏圖，「民族與民族主義概論」，*歐洲研究*，第1期(1994年)，頁16~17。

¹¹ 王聯，「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理論」，*世界民族*，第1期(1999年)，頁8~9。

為系統化的政策與理論，為民族的實際成長過程提供觀念與原則；有時它被視為一種思想狀態，藉此凝聚民族成員的熱情與忠誠；有時它則被作為一種運動的口號與象徵，具有著支持或分裂國家的功用¹²。簡言之，民族主義在不同的環境下有不同的面貌。

周建明指出民族主義常常被奉為最高信條與原則，優先於民主、自由、福利等政治理念，主要以對本民族的強烈認同感、忠誠感以及愛國主義情操等來喚起民眾的情感，藉此動員和凝聚政治資源，用以推動本民族爭取政治、經濟等方面獨立的運動。另外一旦國家真正獨立後，民族主義亦可在各種政治與社會體制中動員民眾，使政府獲得巨大的物質資源與精神力量來追求國家強大¹³，意即政府可操作民族主義來團結內部，共同建設國家。

馬瑞映認為民族主義是指民族為追求內部凝聚性與外部獨立性，在基於相同宗教信仰、文化、歷史等認同上，所逐漸形成一種思維與情感體系，其中體系內蘊含著統一、自由、獨立與發展等概念¹⁴。

徐藍指出民族主義是指近代以來民族在基於對己身文化與歷史的忠誠、歸屬等情感上，為了追求生存、發展、利益等過程中所逐漸產生的，若從意識形態分析，民族主義具有維繫民族的價值觀體系、強化對民族認同、彰顯政府政權的合法性等三種功用¹⁵，顯示民族主義與民族生存發展息息相關。

姜新立指出民族主義具備三項意涵¹⁶：1、民族主義是一種區域性觀念，由於全球交通日益發達，各國的距離逐漸縮小，民族主義也已跨越過往單一主權國家的範圍，向全球多個國家分享同一個民族情操，逐漸形成多個泛民族主義；2、民族主義是一種革命教義，代表著人民參與渠所選擇的民族國家，以及一個民族

¹²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96~97。

¹³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390~391。

¹⁴ 馬瑞映，「民族主義：概念與現實」，**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5年)，頁139~140。

¹⁵ 徐藍，「關於民族主義的若干歷史思考」，**史學理論研究**，第3期(1997年)，頁19~20。

¹⁶ 姜新立，「民族主義的理論概念與類型模式」，**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年)，頁40~41。

積極爭取從另一個民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可以說具有 2 種政治期待，在觀念上自然而然連結到自由與革命問題；3、民族主義是一種權力取向觀念，比如我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召趕走滿清政權，以及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俄國史達林等例子，均顯示民族國家建造者常藉民族主義為號召，以革命暴力來求取政治權力。

洪泉湖認為民族主義具有「雙面刃」性質，有時可作為團結的動力，卻也是分裂的根源，有時被當事國視為福音卻被他國視為禍水，有時可成為積極的建設、拉攏力量或消極的破壞、疏離力量¹⁷。政府要如何妥善運用民族主義來達到政治目的，是項重大挑戰。

梳理各學者對民族主義的觀點，大致上仍可歸納出三項意涵：一、民族主義能團結一群具備相同血緣、語言、文化、情感的人群，共同抵禦外侮並追求國家富強，對此個人必須效忠服從，甚至不惜犧牲奉獻；二、民族主義者堅信自己乃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這樣的信念有時可以成為民族間團結的動力，有時卻可能成為國家內部分裂的根源，可以說是一把「雙面刃」；三、由於對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的強烈渴望，以及過去遭受打壓的慘痛經驗，民族主義者擁有狂熱宗教般的情緒，要求政府對敵人必須強硬不能妥協讓步，否則將視為「民族罪人」，間接對政府決策產生一定掣肘。

上述民族主義的三項意涵均體現於現今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價值觀及表現出的行為，能成為本文在研究進行時的指南與參考，進而對中國民族主義議題提出個人所學及見解。

第二節 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

一、傳統中國無「民族」詞彙

翻閱中國古代的文獻，有關民族範疇的內容中，用來表達「民族」的詞彙相

¹⁷ 洪泉湖，「民族主義基本概念的解釋」，*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1995年），頁3~6。

當多，例如「民」、「族」、「類」、「種」、「部」、「種人」、「民人」、「民群」、「民種」、「部人」、「部族」等數十種，然而卻沒有將「民」、「族」二字連接在一起的詞彙，那麼究竟「民族」一詞在中國何時才開始使用與普及？以及它的來源為何？目前主要有四種主流觀點¹⁸：

(一) 認為我國孫中山先生是首次使用「民族」一詞的人

主要是當時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影響甚大，故自那時的後，「民族主義」在中國開始成為流行的詞彙。

(二) 認為「民族」這一詞彙主要是從西方文化傳播到中國的

在近代史時期，由於西方正值民族主義盛行時期，中國在翻譯外國書籍時，「民族」一詞自然而然被傳到中國，進而開始被普遍使用。

(三) 認為梁啟超的《東籍月旦》一文是中國最早使用「民族」這一詞彙的文章

這論點主要來自於 1982 年在上海出版的《簡明社會科學辭典》一書中，內容提到「民族」這二字連接在一起使用，最早始自於 1899 年梁啟超的《東籍月旦》一文，在進入 20 世紀以後，由於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受到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民族」這一詞彙乃在中國開始普遍使用。

(四) 認為「民族」一詞來自日文

由於日本人常常利用漢字創造新的詞彙，在明治維新(1868~1873 年)的後，由漢文「民」、「族」二字所連接組成的「民族」詞彙開始在日本被普遍使用，很可能在清末時傳進中國，影響諸多中國民主主義革命者的民族主義思想。

觀察上述四項觀點具有一個共同的處，即「民族」這一詞彙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存在且沒有使用，是直到中國近代史時期後才逐漸出現¹⁹。然而，誠如《左傳》所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嚴夷夏的防」、「入於夷狄則夷狄的，入於中國則中國的」，相關說法均體現出中國人與外族的「民族」差異性，既然如此，傳統

¹⁸ 韓錦春、李毅夫，「漢文『民族』一詞的出現及其初期使用情況」，《民族研究》，第 2 期(1984 年)，頁 36~37。

¹⁹ 同註 18。

中國應會有某種「民族認同」，才能用以區隔外族。

二、傳統中國的民族認同

有關「認同」一詞，最早由弗洛伊德指出「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的後慢慢延伸出「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家族認同」等多個詞彙，其意涵大同小異，為人類對己身歸屬於自身國家、文化、家族等的認知與感情依附，而「民族認同」同理，為社會成員對己身歸屬於民族的認知與感情依附²⁰。

目前各界對傳統中國的民族認同，主要有四種主流觀點：

(一) 血統、家庭觀

古書《孟子·離婁上》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意指絕對不能任意絕子絕孫、斷香火，體現了中國古代極度重視血統觀及以的為基礎的家庭觀，由於是以嚴格的血緣為連結所建立起的，故血統遂成為家庭得以存在以及能延續的重要因素，另外為規範血統家庭中的人與人的間的關係，中國古代乃運用仁、禮為本作為家庭倫理，進一步強化了血統觀、家庭觀的重要性²¹。

(二) 地理觀

傳統中國以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作為發展中心，主要是該地北有雪原沙漠、西有大漠荒原、西南有青藏高原、東和南有海洋等環境背景，而逐漸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生存環境。在幾千年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這樣的生存環境除了在以漢族為基礎上融合各族群的多樣性，同時亦加深各區域的間密切的聯繫與向心力，為的後發展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奠定基礎²²。

(三) 文化觀

傳統中國奉行文化主義，認為中國文化是世上最優越也是唯一真正的文明，

²⁰ 王希恩，「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研究**，第6期(1995年)，頁17。

²¹ 魏建國，「中西傳統社會自然觀、血統觀及社會觀比較研究」，**綏化師專學報**，第4期(2000年)，頁118~119。

²²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392。

只要其他民族願意接受中國文化，即儒家思想，就可以合法統治中國，意即國家忠誠是對儒家文化，而非某一政體或民族，至於物質財富方面則較不注重。的所以有這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主要是傳統中國並無面臨太大外來壓力，以及政治家必須學習儒家教育，並根據其原則治理國家²³。這樣的文化主義也被稱為「華夏中心主義」，由於中國文化與制度被中華民族視為最優秀的制度文化，故可作為民族認同符號，然而中國一旦走向衰弱後，華夏中心主義將無法再作為民族認同符號，被迫變成極端封閉排外，以閉關自守方式維護自身優越性，甚至走向解體的結局²⁴。

(四) 政治大一統觀

中國自秦漢以來真正實現大一統，是首次出現的統一的國家政權，這樣的大一統的民族生存形態，很快得到中國各民族的認同並直接上升為民族意識，進而擴大為民族傳統而不得任意改變，逐漸形成「愛統一」而「恨分裂」的民族心態，就這樣隨著中國朝代的發展而相傳下去，即使有任意分裂的情況，其時間並不會太久，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大一統價值觀中，勢必會有另一股強大力量重新統一中國，可以說堅持這項最高價值標準將能留名千古，而違背則將遺臭萬年²⁵。

綜上所述，傳統中國的民族認同共涵蓋血統與家庭觀、地理觀、文化觀、政治大一統觀等 4 項價值觀，用以區隔與外族的民族差異性，以及作為中華民族能夠存在的基礎。然而隨著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開始大舉入侵中國，由於傳統中國的民族認同已經無法確保中華民族能夠生存與發展，中國人被迫切開始追求國富民強，故在傳統中國民族認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具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用以救亡圖存、抵抗外侮以及進行國家現代化建設。

²³ 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71~372。

²⁴ 金觀濤，「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演變」，*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頁 129~131。

²⁵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92~393。

三、西方勢力侵略進而形成中國民族主義

自 19 世紀初葉開始，中國與英國之間因為走私鴉片的貿易問題所產生的衝突不斷發生，清朝政府考量鴉片已對中國社會造成極大危害，故實施禁菸令，並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州負責執行政策，此舉激怒了英國，1840 年乃派遣遠征艦隊侵略中國，自此鴉片戰爭爆發，象徵著中、西方國家的第一次戰爭，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最終中國不敵英國的船堅砲利，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向英國開放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 5 個通商港口，打開了中國的閉關大門，並割讓香港予英國治理，以及向英國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圓。對中國而言，鴉片戰爭失利的最大影響是被迫開創「炮艦出條約」的中外交涉方式，代表西方國家可以不按照西方價值標準行事，完全彰顯了身為勝利者的意志，而身為失敗者的中國完全無談判話語權，在此役的後，隨著中國對抗西方國家的戰爭陸續受挫，相關不平等條約也隨即到來²⁶，刺激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

之後隨著二次英法聯軍戰役的失敗，中國被迫再次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獲得了諸多特權，包括軍艦可航行中國領海、軍隊可進駐中國、治外法權、西方傳教士可到中國興建教堂與傳教、外國商人可招募中國人充當廉價勞工等。同時中國內部亦爆發太平天國的亂，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內戰，總計傷亡人數約 7,000 萬人，其勢力範圍遍及中國多個省份，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下，中國民族主義者逐漸產生危機感，認為唯有「師夷的長技以制夷」，全面學習西方列強的科技文明才能「自強」，故在清朝政府的認可下，於 1861 年開始推動「自強運動」，在中國開展全面工業化，然而甲午戰爭的戰敗證實了僅靠國防現代化仍不足以戰勝西方列強，其自豪的北洋水師艦隊在戰爭中全軍覆沒，最終自強運動以失敗收場。

在自強運動黯然結束後，中國民族主義者開始重新思考要如何抵抗西方列強

²⁶ 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第 3 期(1999 年)，頁 17~18，

的侵略，繼而產生出兩種不同救國方式。第一種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的改革派，認為中國社會政治制度雖不及於西方列強，然而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倫理仍是世界最優秀的文化制度，換言的，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中國文化仍可作為民族認同的符號²⁷。改革派在這樣的思維下，乃積極推行「戊戌變法」，希望在保有部分傳統制度下，能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官僚制度等多方面進行變法，讓中國能學習西方制度，進而重新走向富強的道路。然而戊戌變法最終因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勢力反對而以失敗收場，僅維持短短 103 天，康有為、梁啟超則被迫流亡國外。

在改革派失敗後，證明從制度上的改革來拯救顛覆守舊的清朝政府已不可行，唯有「革命」才能救亡圖存，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乃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力發起革命運動。孫中山在 1894 年在夏威夷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並於 1905 年成立同盟會後，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等三大主張，其具體內容為：對內，主張推翻專制、賣國、顛覆守舊、極端腐敗的清朝政府，但不排斥滿洲民眾，因為民族主義並非是不同族群就要排斥他，而是不允許不同族群任意奪取中華民族的政權，因此革命不是要消滅所有滿洲民眾，而是要光復中華民族的國家，由中國人建立自己的國家與政權，絕無尋仇的意思；對外，則主張全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共處，且堅持被壓迫的民族要勇於爭取獨立與自由，如果中國人能夠真正實現自主，中國人定將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同時也對當時在亞洲的越南、朝鮮、菲律賓、印度等國的獨立運動採取支持與同情的態度²⁸。在孫中山等革命派人士的努力下，1911 年爆發武昌起義，辛亥革命自此展開，最終成功一舉推翻清朝政府，結束中國歷史 2000 年以來的帝制統治，開啟民主共和的新時代，代表著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革命運動成功，對未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與助長作用。

²⁷ 金觀濤，「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演變」，*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頁 132~133。

²⁸ 金沖及，「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第 5 期（2001 年），頁 13~16。

然而即使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困境仍未完全解決，包括：(一)知識分子對於現狀相當不滿，正努力追求改變中國的方法，同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持續壯大，形成了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一股新興社會力量，渠等為保障己身財富安全，對於擺脫西方帝國主義與傳統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的渴望相當強烈，因此這兩股勢力均積極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二)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用中日合辦或借款的方式，滲透到中國經濟的各部門，擴大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同時在中國東北興建諸多壟斷機構，用以作為其侵略基地，此等舉措加劇了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三)民國初年面臨軍閥割據的亂象，各軍閥常利用各種名義向中國人進行經濟剝削，激化了社會間嚴重的矛盾²⁹。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召開巴黎和會，中國與日本同為戰勝國，西方列強卻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劃分給日本，而北洋軍閥政府卻無能為力阻止，引發了中國人累積許久的不滿情緒，廣大民眾、學生、工商人士乃上街抗議表達捍衛國家利益的訴求，其最著名的口號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意即對抗西方列強侵權以及懲處媚日官員，自此「五四運動」全面展開。

五四運動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影響至深，象徵中國人開始以國家主權作為其民族認同，不能再如傳統中國僅追求血統與家庭觀、地理觀、文化觀、政治大一統觀等 4 項價值觀，而是應重點追求國家主權，才能確保對於中國領土的管轄權與政治權力，絕不容許外國勢力置喙，在這樣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始能保障國家生存以及進行現代化建設。簡言之，隨著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開始追求獨立主權用以發展國家建設，乃逐漸形成中國民族主義，成為後續推動救亡存圖、尋求富強等系列國家建設的主要動力。如此的中國民族主義影響了日後 1937 年對日八年抗戰，它促使了全體中國人民不分黨派、跨越地域藩籬齊心抗日，最終如願取得戰爭勝利，而戰後中國亦成功取消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限制，其國際地位不再遭受冷落，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可以說民族主義的目標終於

²⁹ 高峻，「五四運動起因新觀點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第 6 期(1997 年)，頁 66-67。

實現。

四、改革開放初期面臨認同危機

自中共 1949 年取得中國政權後，開始以馬克思列寧思想為主導精神進行國家建設，徹底拋棄民族主義，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逝去，四人幫被抓捕，鄧小平於 1978 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民族主義才又再度興起³⁰，逐漸成為中共操作的政治工具。

然而，此時的中國民族主義並非如清末民初時的慷慨激昂，而是展現出低姿態與懷疑自身的態度，其主因有二：(一)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下，其外交政策欲從毛澤東時期所提倡的世界革命轉為加入國際社會，故對外採取較為謹慎小心的態度，其中最明顯的特徵誠如汪宏倫所言「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字詞在此時期開始大量出現，中共領導人不論在何種場所談及任何議題，均可見大量使用該字詞，展現出一種低姿態的態度，與毛澤東時期可謂天壤的別，代表著中國對於無法改變國際現狀的不平的鳴³¹；(二)由於對過往文化大革命以及當前經濟發展的不滿，在大量西方思想於改革開放時引進中國後，中國人開始反思西方的民主化觀念或許才能夠真正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其中《河殤》的出版更引領中國人對傳統文化進行嚴厲批判，認為中國傳統威權主義的政體以及落後的現況均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唯有效法西方才能實現國家現代化，表達出對西方文化的嚮往，形成了「文化熱」現象³²。簡言之，此時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雖亟欲修補對外關係期能融入國際體系，惟在實踐上面臨不少困難，乃採取謹慎小心姿態，有別於毛澤東時期的不可一世態度，展現出低姿態的態度；另對於中國現況的不滿，促使開始透過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批判與反思中重新尋找認同目標，由於對自身文化的懷疑與否定，形成了嚴重的認同危機。

³⁰ 孫國棟，「民族主義與民族文化—兼談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頁 183~184。

³¹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第 19 期(2014 年)，頁 217~218。

³²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434~435。

五、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再度高漲

90年代的來臨，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無疑是莫大考驗，一是1989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派遣解放軍赴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在場的示威民眾，引發舉世譁然，除遭致西方嚴厲譴責與經濟制裁外，此舉亦直接打擊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加深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二是1991年蘇聯解體，象徵冷戰的結束以及共產政權的崩潰，中國群眾開始反思共產主義是否還能有效帶領國家發展。此兩事件均凸顯出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迫使中共開始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積極利用民族主義作為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工具，以鞏固權力合法性。

同時，隨著美國等民主國家的主要對手蘇聯的解體，乃開始視中共為下一個主要競爭者，因此「中國威脅論」開始甚囂塵上，美國開始對中國採取系列圍堵、打壓措施，包括1993年申奧失敗、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2001年美中軍機互撞以及當前美「中」貿易戰等事件，均可見到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對中國加大遏制、干擾的舉措，此舉反而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強烈的反西方情緒，一改80年代「親西方」的態度，其中最為代表性為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與2009年《中國不高興》兩本書籍的出版，在《中國可以說不》中有言論認為³³：

為什麼不可以做「超級大國」？我們不可以爭取做世界勢力的積極領導者和強大斡旋者；我們沒有理由因「瓜田李下」的嫌向世界隱蔽掉我們的雄心；惟恐這苦心積慮為西方人所輕慢；苦心積慮在未來更加尖銳的國際矛盾中會不會顯得孱弱無比？西方就在我們的地盤上動手，主權這樣的基本問題上蒙受羞辱。

而在《中國不高興》中亦有言論認為³⁴：

³³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頁32~33。

³⁴ 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等著，「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26~128。

中國人歷來有股子衝動，在內不服輸，在外不低頭，總是在爭，使社會富於張力，紅眼仇富恰恰是中國民族的力量所在，一來鼓勵出類拔萃，拉大差距，二來成就你追我趕，縮小差距；不要被濫用，可成為中國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戰略資源；打倒拳王實現全球範圍評等公正，最終改造國際秩序，打碎拳壇，使人類發展進入更理想的境界。

此等帶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言論均凸顯出中國人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及國際體系的不滿與憤恨，且西方相關的打壓舉措更讓中國人再度回想起清末民初遭受西方列強欺侮的慘痛經驗與血淚史，在上述因素的交錯影響下，中國民族主義再度高漲，持續影響著至今中國發展。

綜觀整個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我們可發現中國民族主義自清末民初時因遭致西方列強侵略而興起，其中以五四運動最具代表性，其主要不滿對象是對顛預守舊的清朝政府、割據紛爭的軍閥政府以及傳統中國文化，認為既有的政治、文化制度已不能保障國家生存與進行現代化建設，故要革命推翻舊政權且引進「德先生」、「賽先生」等新思維來取代的；而冷戰後再度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一樣是遭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打壓與遏制，然而究責對象不再是當權政府，而是不滿當前被西方霸佔的國際體系，認為種種國際規則均嚴重制約中國的發展，故期待中共能團結內部，對外宣揚中國文化，共同抗衡西方強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使犧牲部分自由人權也在所不惜，可以說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力度遠比清末民初時的當權政府高，有助藉此鞏固其執政合法性，同時在五四運動期間遭棄的如敝履的中國傳統文化，迄今又再度成為重要的中國價值內涵。簡言之，隨著中國歷史的推進與發展，中國民族主義從原本對傳統政治、文化制度的反對態度，逐漸轉為支持中共政權運用傳統中國文化資源抗衡西方文明，即使犧牲部分民主自由也在所不惜，只求中國再度偉大復興，在此轉變下，中國民族主義逐漸成為可供中共進行政治操作的工具。

第三節 中國民族主義的功能

中國民族主義旨在最大力量團結內部，達到救亡圖存、抵抗外侮以及進行國家現代化建設等目標，本節將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類型、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關係等三大角度來進行探討，期能結合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從中梳理其功能性。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類型

(一) 中國政治民族主義

政治民族主義目標是建立民族主權國家，以政治主權與國家政權作為認同符號，強調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態是民族自我統治的政府。中國政治民族主義對中國發展影響至深，起源於清末時對政局的不滿，期望能成立民族國家取而代之的，進而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例如汪精衛在《民報》第一號刊出的《民族的國民》中強調民族主義的核心是組成民族國家：「凡民族必被同一的感蒙，具同一的知覺，既相親比以謀生活矣。其生活的最大者，為政治上的生活。故富於政治能力的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國家的主義。此的主義，名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亦稱「民族主義即為國族主義」，可以說，此階段中國政治民族主義的主軸是反清朝政府、解決內政問題，而民國成立後，中國政治民族主義仍持續高漲，其主軸為反帝國主義與抵抗西方列強侵略，其中逐漸形成中國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在當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必須以武力為手段進行革命，才能推翻帝國主義，中國人必須傾注全力進行政治鬥爭，採取激烈批判的態度，此乃實現中國富強的無奈之舉³⁵。簡言之，唯有團結內部向外反抗，才能真正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迅速發展，中國人的民族信心與自尊心大幅上升，然而卻引發中國人對共產主義過去推動改革措施的質疑，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更加深中國人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質疑，對此，中國政治民

³⁵ 俞祖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類型、格局及主導價值」，*齊魯學刊*，第 2 期(2001 年)，頁 49~52。

族主義開始聚焦在愛國主義上，例如中共中宣部 1994 年 8 月 23 日出臺《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要求做好愛國主義工作，體現於唱國歌、向國旗敬禮等行為，甚至可以為此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中共此舉旨在避免中國分崩離析，並強化政權的合法性及凝聚人民的認同感³⁶。顯示中共開始運用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操作的工具。

(二) 中國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主要指民族國家透過政府運用行政力量，對企業或產品實施保護政策，防止外國企業併購國內企業與進口外國商品，以利國家在面臨國際經濟競爭的環境下，能夠保護民族產業及國家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民族主義起源於清末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被迫開放通商口岸的後，西方列強憑藉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特權，大量進口外國產品，造成中國在國際貿易中逐漸由出超轉為入超，在此嚴峻的環境下，部分有志之士開始深思要如何抵制外國經濟侵略、振興民族經濟，中國經濟民族主義乃開始逐漸盛行，其具體行動主要有三項³⁷：

1. 抵制外貨、提倡國貨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因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外國貨品大量進口中國，積極搶佔中國市場，不利國貨的發展，在進入近代中國後，隨著中國工業的初步發展與愛國情緒高漲等情況下，開始展開抵制外貨與提倡國貨運動，期能有效抵制西方國家的經濟侵略，並能推進民族工商業發展，強化國家經濟實力。

2. 實業救國

「商戰」思維自 19 世紀 70 年代以後開始逐漸盛行，意即認同以發展工商業為先來追求國家富強，以抵抗西方國家的經濟侵略，在此思維的基礎上，中國出現了「實業救國思潮」，乃透過發展實業作為救國家的主要手段，體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於是各中國商人乃紛紛投資實業，推進了民族工商業的進一步發

³⁶ 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新北市：韋伯文化，2009 年)，頁 276~277。

³⁷ 李宗超，「近代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理性與非理性—以抵制外貨為中心」，**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6~32。

展。

3. 收回利權

為搶回西方國家利用不平等條約所掠奪的中國鐵路修築權與礦山開採權，中國人於 1904 年開始展開收回利權的愛國運動，在經過多年激烈的抗爭後，西方列強被迫逐漸讓步，中國陸續收回粵漢鐵路、蘇杭甬鐵路、川漢鐵路、津浦鐵路、滬寧鐵路等鐵路的部分權益，同時亦成功從英國福公司收回礦山開採權。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迅速發展，在「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政策基調下，逐漸展開經濟區域整合及與國際經濟接軌，於 2010 年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現階段已達成過往「超英趕美」的目標，未來期望能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世界超強的一，甚至取而代之的成為霸權國家，此為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³⁸，凸顯其強烈的企圖與野心。

(三) 中國文化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是由共同祖先與土地的根源構成了其核心內涵，是較為自我封閉的民族意識，強調族體的親合性及國家的地緣性³⁹。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傳統主張華夏中心主義，即使它於 20 世紀初開始逐漸式微，然而部分中國人對中國文化仍保持強烈的驕傲感，認為中國文化是世上最優的文化，故逐漸形成新的中國文化主義，期望能以中國文化拯救陷入物質疲憊的西方文明，最終能讓全世界走上中國的道路⁴⁰，並逐步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

冷戰後的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認為中國就能代表亞洲來弘揚東方的亞洲文化，主張以「亞洲價值」的東方民族主義形式展現，並以「振興中華」作為主要的口號⁴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中共前總理李鵬於 1996 年 9 月 4 日在中共

³⁸ 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新北市：韋伯文化，2009 年)，頁 293~294。

³⁹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的緣起及主要特徵」，**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7 年)，頁 42~43。

⁴⁰ 俞祖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類型、格局及主導價值」，**齊魯學刊**，第 2 期(2001 年)，頁 50~51。

⁴¹ 劉性仁，「中國大陸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概念性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93 期(2009 年)，頁 142~143。

政協所舉辦的「展望二十一世紀論壇」，發表名為「中國的發展和亞洲的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的講話，內容強調「中國是亞洲的一員，中國同亞洲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亞洲，亞洲的發展也需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中國；亞洲的安全問題，要由亞洲國家和人民來解決，外部勢力的介入，往往於事無補，有時甚至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充分重視亞洲優秀文化傳統在促進和平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東亞文明正在給人類新的啟迪」⁴²，等於在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宣示，在文化上「中共代表中國，中國代表東亞，東亞代表亞洲」，並將亞洲文明提高至普世性價值的地位⁴³。

綜上所述，中國政治民族主義自改革開放後逐漸聚焦在愛國主義上，透過唱國歌、向國旗敬禮等行為展現對國家的忠誠與熱愛，即使群眾對政府施政不滿，但在為國家發展而必須團結的愛國主義情懷上，多能選擇忍受或採取較溫和的方式表達訴求，即使偶有上街抗爭運動，但仍願遵守中共的「管理」而較無激烈情事，有助於中共維護社會穩定，並鞏固政權合法性；而中國經濟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則聚焦於如何彰顯自身國力與影響力，期望最終能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國家，甚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同時將中國文化無遠弗屆傳播出去，要求全世界接受中國文化，不再讓西方文明壟斷世界文化價值觀，有助於中共建構大國形象。

二、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為各政黨維持政權合理性的重要思想基礎。中共在建政初期，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運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等構成的官方意識來凝聚整個社會力量，然而進入後冷戰時期後，國內外局勢發生劇變，社會各階層的思想與價值觀念亦發生改變，原有的官方意識形態已不能再說服民眾支持共黨執政，導

⁴² 李鵬，「中國的發展和亞洲的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中國政協新聞網，2005年9月4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51372/51376/51493/3599646.html>。

⁴³ 同註40。

致中共面臨了嚴重的信仰、信任以及政權合法性等危機，因此亟需新的意識形態向民眾證明中共仍具有執政合理性與正當性，以利再次重新凝聚民眾向心力⁴⁴。故民族主義作為國家與社會共同體的凝聚力的功能彰顯了出來，中共乃順勢運用民族主義為號召，重新凝聚國家資源發展建設，進而鞏固其執政地位⁴⁵，成功作為中共可操作的政治工具。

同時間，中國逐漸進入大規模的體制轉型時期，此時對中共而言需要有足夠的政治合法性資源，才能在這轉型過程中穩定政治秩序，凝聚社會向心力，然而單靠過往愛國主義的傳統模式仍難以全面凝聚社會向心，故乃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與整合的新資源，其原因有二⁴⁶：

- (一) 儒學在過往受制於傳統專制制度的官學化意識形態，常常具有「抗現代性」的特點，故對於西方文明的傳入相當排斥，嚴重制約了中國現代化發展，而如今中國已不再有讓儒學保守化的社會文化環境。
- (二) 儒學的內涵包括以內在良知為基礎的憂患意識，「求仁得仁」、「自強不息」、「為仁由己」的道德自主性，「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等，這些內涵在中國進行近代化發展過程中，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依托點，並成為民族成員安身立命的基礎，尤其隨著儒學復興運動自 20 世紀以來的興起，為發掘儒學中的內在意識，並使其與當代結合提供可行模式與豐沛資源。

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亦可作為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工具。冷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遏制中國的實力崛起與擴張，乃醞釀出「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論點，對此，中共乃開始重視「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運用，而不再一味使用「剛性權力」(Hard power)與西方國家正面衝突，在柔性權力的應用上，乃運用儒家文化中蘊含的「和平」、「仁義」、「德治」等意涵，透過政治

⁴⁴ 卜建華，「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探析」，**東嶽論叢**，第 4 期(2010 年)，頁 163~164。

⁴⁵ 蕭功秦，「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與前景」，**戰略與管理**，第 2 期(1996 年)，頁 59~60。

⁴⁶ 蕭功秦，「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戰略與管理**，第 4 期(1994 年)，頁 23~24。

操作向國際進行大量的文化行銷，以消弭國際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敵意，重塑中國對外文化利基與和平形象，與中共向來強調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主張相呼應，其中最具體的措施為在各國大量建立「孔子學院」，由教育部負責指導，其轄下的國家漢辦負責推動學院相關業務，主要任務為推廣中華傳統文化向海外輸出，以及作為中西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溝通平臺，透過開展漢語教學、培訓教師、文化交流等工作，期能擴大中國文化在國際的文化影響力，傳達中共的政治價值觀⁴⁷，讓各國能逐漸接受中國已經崛起的事實。

綜上所述，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中共重要的意識形態，在逐漸融入儒學傳統精神並與現代思想結合後，已成為繼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後讓中共能有效凝聚社會向心力的重要工具，有助於維護中國社會穩定，並維護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另外亦可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用以反制美國等西方國家企圖以「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論點遏制中國發展，例如透過在各國設立「孔子學院」大力宣揚中國儒家文化，以消弭國際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敵意。

三、中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關係

冷戰後中國陸續經歷了六四天安門、蘇聯共產政權的解體等重大事件，前者中共派遣瞭解放軍赴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在場的示威民眾，引發舉世譁然，除遭致西方嚴厲譴責與經濟制裁外，此舉亦直接打擊 1978 年以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加深了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後者則象徵冷戰的結束以及共產政權的崩潰，中國群眾開始反思共產主義是否還能有效帶領國家發展。此兩事件均凸顯出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迫使中共開始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積極鞏固權力合法性。

而中共愛國主義的具體意涵，可從 1990 年江澤民的對外演說以及 1994 年頒布的《愛國主義實施綱要》得知。1990 年 5 月 3 日，為紀念五四運動 71 周年，

⁴⁷ 楊以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7 年)，頁 24~46。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發表《愛國主義與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的演說，重點內容如次⁴⁸：

在我國歷史上，愛國主義從來就是動員和鼓舞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抵禦外來侵略和推動社會進步中；我們所講的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體現人民群眾對自己祖國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進歷史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同維護國家獨立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剝奪我國人民主宰自己國家命運的權利，使中國變成西方大國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並且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宣揚愛國主義傳統，需要廣泛深入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種教育要從少年兒童抓起。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都要認真學習和瞭解祖國的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歷史；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的獨立和富強，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貢獻畢生精力，以此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

另外中共中宣部於 1994 年 8 月 23 日頒布《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共有 40 條，分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愛國主義教育的重點是青少年、搞好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建設、創造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氛圍、提倡必要禮儀與增強愛國意識、大力宣傳愛國先進典型、加強對愛國主義教育的領導等八大領域，訂下了未來中共愛國主義的具體工作事項，重點內容如次⁴⁹：

第 13 條，要進行民族團結教育。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

⁴⁸ 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 年 1 月 4 日，http://www.cssn.cn/lxx/lishixuezhuanli/bwxcxljsm/lxzyys/jzm/201801/t20180104_3804433.shtml。

⁴⁹ 中共中宣部，「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國青少年宮協會，2010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cnypa.org/shhyzc/877278.jhtml>。

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疆，不論是在漢族地區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都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宗教觀和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教育，大力宣傳各族人民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歷史貢獻；第 16 條，各類大專院校都要積極創造條件，開設中國歷史、文學、藝術、科技等內容的傳統文化選修課，開設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專題講座；第 20 條，各級黨委宣傳部門要遵照當地黨委和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會同教育行政部門、共青團組織和文化、文物、民政、園林等部門確定一批教育基地；第 29 條，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需要提倡必要的禮儀，特別要提倡有助於培養對國旗、國歌、國徽崇敬感的必要禮儀，增強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感；第 35 條，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加強典型宣傳，發揮榜樣的示範作用。

從以上江澤民的演說與《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內容可知中共愛國主義具有四項意涵：(一)愛國主義的首要目標是團結內部，用以抵禦美國等西方國家自冷戰後開始加大對中國的遏止舉措，包括企圖以和平演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等，並承接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成果，持續推動國家建設與社會進步；(二)在此嚴峻的國際局勢下，亟需廣泛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尤其置重於灌輸知識分子與青年愛國主義思想，讓渠等能將國家的利益置於人生的最高價值，願意貢獻畢生心力維護，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三)向中國內地或邊疆的民族宣揚中共為唯一大中華民族的代理人，各民族均要為維護民族團結而接受中共領導；(四)透過廣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提倡升國旗與唱國歌的禮儀、宣傳愛國英雄事蹟等多元方式，增強群眾的愛國主義情感，進而鞏固對中共政權的支持。

從這四項意涵可觀察出中共冷戰後的愛國主義主要是為應處國內外危機，透過愛國主義重新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缺，作為說服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與青年支持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依據，同時透過唱國歌、升國旗、學校教育等方式，將愛國主

義精神融入、灌輸群眾的日常生活中，群眾因為愛國而願意愛黨，自然欣然接受中共的領導，較不易因不滿政局而有上街抗爭等激烈活動，有助中共維護社會穩定。然而，愛國主義雖能有效團結內部，卻也埋下隱憂，例如若讓知識份子與青年時常懷抱強烈的愛國心，此情緒恐將無所節制地到處蔓延，比如 1996 年由一群大學生出版《中國可以說不》所掀起的民族主義風潮、網路論壇存在的「憤青」、「小粉紅」等現象，雖能有助中國建構大國形象，卻也對中共治理造成一定困擾，若處理不慎恐將反噬中共，同時此強烈的愛國情緒，也成為了促成日後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重要因素。

觀察中國愛國主義的意涵似與民族主義雷同，同樣用於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密切聯繫的，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一)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均是對國家的一種強烈認同與忠誠感；(二)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而言，群眾對己身團體均有著一種特殊的關切；(三)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均與國家相聯繫的⁵⁰。也可以說，愛國主義是從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概念，是民族主義所含有的政治意涵，是包括在民族主義的內的概念，同樣用於凝聚群眾認同感，避免國家分崩離析，然而中共並不喜歡使用民族主義的詞彙，因為其帶有西方色彩且有諸多負面因素，例如「狹隘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盲目排外主義」等，而愛國主義則相較民族主義較為客觀且符合中國現實，故中共對外通常以愛國主義代替民族主義⁵¹。簡言之，即使中共對外使用愛國主義辭彙，其政治內涵仍與民族主義一致，同樣用於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政治操作。

綜觀本節探討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類型、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關係等議題，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具有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一旦中國受到外在勢力的挑戰與刺激，它能最大力量團結內部，用以救

⁵⁰ 李樂，「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關係研究述評」，*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1 期(2010 年)，頁 55~56。

⁵¹ 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新北市：韋伯文化，2009 年)，頁 306~307。

亡圖存、抵抗外侮以及進行國家現代化建設，即使犧牲部分個人權利也要達成，雖然對目前中共當局形成了莫大壓力，因為若無法達成所託，在個人平常忍受國家種種要求與限制所逐漸積累的不滿與壓力下，恐爆發嚴重反彈情緒而面臨嚴重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然而觀察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因國力逐漸興起而漸遭致西方國家的挑釁與挑戰，且面臨內部群眾對共產意識形態的質疑，卻多次利用中國民族主義的期待情緒來進行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政治操作，有效應處內外挑戰，隨著未來美中兩國實力差距越趨接近，以及群眾對中共社會治理的不滿增加，相關歷史案例或將一再上演。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主要探討了民族主義的定義與意涵、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表現類型、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關係等議題。從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與發展分析，發現它自清末民初時因遭致西方列強侵略而興起，其中以五四運動最具代表性，其主要不滿對象是對顛覆守舊的清朝政府、割據紛爭的軍閥政府以及傳統中國文化，認為既有的政治、文化制度已不能保障國家生存與進行現代化建設，故要革命推翻舊政權且引進「德先生」、「賽先生」等新思維來取代的；而冷戰後再度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一樣是遭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打壓與遏制，然而究責對象不再是當權政府，而是不滿當前被西方霸佔的國際體系，認為種種國際規則均嚴重制約中國的發展，故期待中共能團結內部，對外宣揚中國文化，共同抗衡西方強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使犧牲部分自由人權也在所不惜，逐漸成為可供中共進行政治操作的工具。

另外透過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類型、意識形態、與愛國主義關係等面向觀察，並結合它的起源與發展，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具有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一旦中國受到外在勢力的挑戰與刺激，以及群眾對施政的不滿時，中共能運用它的三大功能作為政治操作工具，能有效轉移對執政當局的不滿，以團結內部抗衡外敵，藉此更加鞏固政權合法性。然而此研究發現仍

欠缺實際案例驗證，故下一章將利用三個著名案例，從中驗證中共運用民族主義有無發揮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並據此綜合評析。



第參章 中國民族主義的功能驗證

本章主要利用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2013 年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2014 年成立「孔子學院」等案例，從中驗證中共運用民族主義是否有發揮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並據此綜合評析。

第一節 鞏固政權合法性

一、中共操作民族主義鞏固政權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是指政府權威在意識形態上獲得最大的合理性，其主要有 4 項來源¹：(一)政府讓民族成員充分享受民主權利，能夠真正公平地對待民族成員；(二)政府透過操縱政權的象徵來支持其合法性；(三)民族成員同意政權統治；(四)政府為民族成員提供安全保障、心理歸屬、經濟成長等功能。一旦政府權威向民族成員證明已經完成此 4 項合理性的要求，民族成員將會相信政府權威具有合理性。

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則認為政權合法性具有結構、個人品質、意識形態等 3 項不同的來源²：

(一) 結構

傳統的政治結構與規範若能維持較長的時間運作，成員會因而產生出強烈的依附傾向，例如美國人對憲政主義就帶有強烈的情感，極力反對在任何形況下擅自變更憲法，這樣的信仰恰好為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二) 個人品質

政治權威的領導者透過個人魅力、真誠的感召甚至是蠱惑人心的宣傳等方式，來贏得成員的支持與忠誠，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了政治權威領導者的合法性

¹ 卜建華，「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探析」，*東嶽論叢*，第 4 期(2010 年)，頁 163~164。

² 大衛·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臺北：桂冠圖書，1992 年)，頁 347~361。

地位。

(三) 意識形態

政府權威利用意識形態作為控制的工具，滿足民眾身為人的希望與渴望，藉此有效操縱渠等的思想，讓民眾支持朝著政府權威希望的方向去發展。

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在其歷史發展的洪流中各有不同。自中共 1949 年建政的後，中共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關注遠比發展國家經濟建設高，與劉少奇、鄧小平等關注經濟建設的領導人的分歧也不斷加大，1966 年夾雜著權力鬥爭的因素，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此時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與毛澤東個人的魅力與威望緊密聯繫一起，形成廣大民眾對毛澤東的狂熱支持，然而卻對中國造成了莫大的禍害，直到毛澤東去世後，這場混亂才終於結束³。

毛澤東死後，中國人對毛持續的政治動員卻沒有解決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開始感到不滿，進而對共產黨以及領導人的正確性與合法性產生懷疑，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遂轉為強調「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政治工作要落實到經濟上面，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等論調，以發展經濟作為中共新的政權合法性的來源，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定調為改革開放的政策基調，雖然此種「我帶來經濟增長，你接受我統治」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人只有被動強迫接受的選擇，然而實際上中國人也默認了中共新的合法性來源。至於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並未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而放棄它，而是致力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既有的意識形態，以確保社會穩定與共產黨的權威，也就是說任何經濟改革均要在中共的控制的下。簡言之，經濟增長在 1978 年的後已成為中共政權的新合法性來源，而意識形態則成為了第二保險，除了可以減少改革所遭遇的內部阻力，亦能隨時抵抗來自外部的挑戰⁴。

³ 張健，「合法性與中國政治」，**戰略與管理**，第 5 期(2000 年)，頁 5~6。

⁴ 同註 3，頁 6~8。

冷戰後中共政權合法性再度面臨重大考驗，一是 1989 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派遣解放軍赴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在場的示威民眾，引發舉世譁然，除遭致西方嚴厲譴責與經濟制裁外，此舉亦直接打擊 1978 年以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加深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二是 1991 年蘇聯解體，象徵冷戰的結束以及共產政權的崩潰，中國群眾開始反思共產主義是否還能有效帶領國家發展，在這樣的不利背景下，中共乃運用民族主義為號召，將其緊密地與中共政權聯繫在一起，用以填補其權力真空，意即中國民族主義正式成為中共政權的新合法性來源。

至於中共為何選擇了民族主義來維繫政權合法性，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意識形態上面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相矛盾，若為發展經濟而捨棄共產主義將導致在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的真空，故只能被迫選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兩相兼顧的意識形態；二是中共目前已無法再透過展現如同毛澤東、鄧小平的個人魅力來維繫政權合法性；三是中共深怕和平演變導致政權垮臺，故政治制度絕對不允許民主化，因而無法透過民主制度的運作來維繫政權合法性，只能以意識形態爭取民眾支持來維繫政權合法性。然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尤其當中的「社會主義」不具吸引人的條件，反而「中國特色」才能真正吸引人心，而「中國特色」在具體實踐的政治宣傳上，成為了「愛國主義」，其本質即為民族主義⁵，意即中共運用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操作工具，來維繫其政權合法性。

綜上所述，冷戰後中共利用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政治操作工具，用以鞏固政權合法性，然而此論點僅為各家說法，尚欠缺實際案例驗證，以下將利用案例來驗證中共運用民族主義有無發揮鞏固政權合法性的功能，並據此綜合評析。

⁵ 田麗虹，「改革開放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維繫—民族主義與合法性」，**共黨問題研究**，第 9 期 (2002 年)，頁 23~24。

二、 案例探討—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

(一) 事件經過

1999年5月8日凌晨6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發射了5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擊中了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其中第1枚炸彈在使館高級外交官的宿舍牆角下爆炸，炸出一個數米深的大坑洞，造成中國記者邵雲環不幸身亡；第2枚炸彈穿透樓頂落在使館的中央，位在3樓的辦公室受到嚴重破壞，屋裡用具和床上用品全都被燒毀，2樓會計室的許多帳目以及物品遭到焚毀，1樓大廳亦被炸的一片狼藉；第3枚炸彈落在使館的西北角，造成另2位中國記者許杏虎和夫人朱穎不幸罹難；第4枚炸彈從地面上的窗戶鑽進地下室，造成俱樂部大廳爆炸，裡面鋼梁、破牆、鐵架、磚塊全部亂成一團；第5枚炸彈則剛好落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外交官潘佔林的官邸中央，雖沒有爆炸，但它巨大的衝擊使官邸同樣遭到嚴重破壞⁶。

雖然事後北約堅稱是誤炸事件，但據現場中國記者轉述，北約的轟炸並不是完全誤擊，而是有目的、故意的，欲透過5枚戰斧式巡航導彈從不同的角度轟炸中國大使館，其中1枚導彈特別瞄準大使官邸，由於它的位置相當空曠，並無任何軍事目標，故北約誤擊的說法難以成立，很明顯是北約透過準確的情報，清楚知道大使官邸的位置，欲透過導彈將包括大使在內的中國人全部炸死⁷。

逝去的中國記者朱穎的父母事後接受訪問悲痛的表示，「我要記住你們的罪，向全世界人民、全世界的母親呼籲愛好和平。如果再有戰爭的話，你們心愛的兒女也會像我的女兒一樣，死在砲彈中，只有和平才能保住你們兒女的安全，保住你對兒女的愛；我們曾經以為冷戰後的世界應該就天下太平了，現在看來這個想法過於幼稚，戰爭離我們並不遙遠」⁸。

⁶ 潘佔林，「回憶我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現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2017年10月21日，<http://fpag.fmprc.gov.cn/chn/wyzj2/shgc/t720083.htm>。

⁷ 呂岩松，「通訊：我親歷中國使館被炸」，環球時報，1999年5月9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0986.html>。

⁸ 楊瀾，「楊瀾和朱穎家人一席談」，文匯報，2019年5月9日，<http://www.gmw.cn/03zhuanti/2004-00/jinian/jnzj/xzw/47.html>。

(二) 事件處理

爆炸案發生後，中共立即透過不同管道向北約表達嚴重抗議，包括當日上午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一野蠻暴行表示極大憤慨和嚴厲譴責，並提出最強烈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此承擔全部責任。中國政府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⁹。當日下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緊急召見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杰，向北約提出最強烈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違背《聯合國憲章》、踐踏《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關於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以及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居然對中國大使館進行導彈襲擊，粗暴侵犯中國主權，這在外交史上是罕見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一野蠻暴行表示極大憤慨和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此承擔全部責任」¹⁰。5月10日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再次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杰提出嚴正交涉，並提出4項要求：1、公開、正式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中國受害者家屬道歉；2、對北約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事件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3、迅速公佈調查的詳細結果；4、嚴懲肇事者¹¹。

至於美國等北約國家則透過不同方式向中國表示哀悼與道歉，包括爆炸案當日舉行了3場記者會，強調爆炸案為一個「可怕的、悲劇性的錯誤」，對於3位中國記者的不幸罹難，向中國政府與遇難者家屬表示遺憾與哀悼。5月9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致信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於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表示道歉與真誠的哀悼。同時德國、義大利、德國等北約國家亦透過致函或致口信的方式，就爆炸案分別向江澤民表示深切的遺憾，並對罹難者家屬表示慰問¹²。5月1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接受記者訪問表示，「我已經向江澤民主席和中國人民表

⁹ 中國政府，「中國最強烈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新華社**，1999年5月8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0856.html>。

¹⁰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向以美為首的北約提出最強烈抗議」，**新華社**，1999年5月8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0889.html>。

¹¹ 「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一年備忘錄」，**人民網**，1999年5月10日，<http://news.sohu.com/20/11/news200731120.shtml>。

¹² 同註11。

示了道歉。我要再次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說，我對此表示道歉和遺憾。同時，我要重申，我們致力於加強美中兩國之間的關係」。當日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也接受記者訪問表示，「我重申我們對由於北約錯誤轟炸導致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人員傷亡表示深切悲痛。中國人民想必瞭解，包括柯林頓總統在內的北約領導人已經就這一悲劇性錯誤作出了道歉」¹³。

美中兩國於 5 月 14 日正式通電話，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我願對發生在貝爾格萊德的悲劇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傷人員和遇難者的家屬表示我個人的哀悼，我將盡最大努力處理好這場『悲劇』，使兩國關係恢復正常發展」，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則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這一事件承擔全部責任，當務之急，美國政府應該對這一事件進行全面、徹底、公正的調查，並迅速公佈調查結果，滿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¹⁴。6 月 16 日，美國總統特使、副國務卿皮克林赴北京向中國政府說明爆炸案調查結果，認為此案是由美國政府部分部門的一系列失誤所導致的「悲劇性誤炸」事件，至於相關人員懲處仍待美國內部調查結束後再行決定，對此，中國政府指出美國此調查結果難以令人信服，強調美國必須以實際行動向中國政府與人民做出滿意的交代¹⁵。12 月 16 日，美中兩國正式就爆炸案的賠償問題達成協議，美國必須向中國支付 2,800 萬美元，作為對爆炸案對中國所造成的財產損失賠償¹⁶。2000 年 4 月 9 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正式對爆炸案中涉案的 7 名官員進行懲處，其中 6 名遭到紀律處分，1 名則遭解雇¹⁷。自此，美中官方在爆炸案的處理上才終告結束，然而，因

¹³ 「美國領導人就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公開道歉」，**新華社**，1999 年 5 月 11 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11165.html>。

¹⁴ 「克林頓總統與江澤民主席通電話再次就我駐南使館遭襲擊事道歉江澤民主席重申我政府嚴正立場」，**中國外交部**，2000 年 11 月 7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1368.shtml>。

¹⁵ 「美總統特使來華報告美政府對襲擊中國駐南使館調查結果，中國政府指出美方迄今所作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並且強調美方必須作出令中國人民滿意的交待」，**人民日報**，1999 年 6 月 18 日，<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kangyi/199906/18/61803.html>。

¹⁶ 中國外交部，「中美就中美就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的賠償問題達成協議」，**新華社**，1999 年 12 月 16 日，<http://news.sina.com.cn/china/1999-12-16/42554.html>。

¹⁷ 「美中情局處理與中國駐南使館被炸有關的七名官員」，**新浪新聞中心**，1999 年 4 月 9 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2000-4-9/80168.html>。

爆炸案所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迫使中共必須採取政治手段來緩和民眾過激情緒，避免稍一不慎，中國民眾的不滿轉移至中共領導者，威脅其執政地位。

(三) 中國民間爆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1999年5月8日爆炸案發生後的下午，中國各地爆發多起反美遊行，北京、成都、上海、廣州等各大城市的示威人潮不斷湧現，中國民眾情緒相當激動，高舉著反美國與反美約的標語，要求血債血還與解散北約，部分民眾甚至包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憤怒地用物品砸碎使館的玻璃窗，拼命往裡面丟東西，還有民眾焚燒假美軍頭像洩憤，迫使美國大使及使館人員只能待在館裡，中共為維持秩序避免失控，乃派遣大批公安、武警守候在使館周圍¹⁸。然而此股民怨除了針對美國外，對於中國政府的處置亦有所不滿，在部分抗爭現場出現了「江澤民：縮頭烏龜」、「想起了毛主席」、「還不如換清政府」等口號¹⁹，認為中國政府在爆炸案的處置上過於軟弱，不應該讓美國繼續欺負中國²⁰。對於中共而言，適當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以容忍的，但若過頭而影響其執政地位的話是絕不允許的，故中共必須採取政治手段，來緩和、轉移民眾的過激情緒。

(四) 中共利用民族主義鞏固政權合法性

爆炸案發生當日上午，中共立即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共做出3項決議，其中第2項「應積極引導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民眾抗議活動，以防影響社會穩定」，等於中共容許民眾上街遊行示威，向美國及北約國家表達嚴重抗議，以藉此宣洩民眾不滿情緒。當日下午，中國各地的反美抗爭活動在中共默許下如火如荼的展開，然而此民族主義情緒亦慢慢延燒至中國政府，民眾認為中國政府在爆炸案事件的處置上過於軟弱，甚至有前述的「江澤民：縮頭烏龜」、「想起了毛主席」、「還不如換清政府」等口號出現，此現象已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範圍，故中共開

¹⁸ 「小莉看時事：生命對戰爭的疑問」，**鳳凰衛視**，1999年5月20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2040.html>。

¹⁹ 宗海仁，**朱鎔基在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頁59-88。

²⁰ 「中國青年對美國愛恨交織」，**BBC中文網**，2001年4月8日，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267000/12677141.stm。

始採取系列政治措施來緩和民族主義情緒，包括 5 月 9 日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發表講話，聲稱中國政府已採取嚴正措施，並肯定群眾維護主權、堅持正義及反對侵略的抗議行動，然而仍要防止過激行為，避免有心人士趁機擾亂社會秩序，要堅決確保社會穩定；5 月 10 日中共下令各大電視臺暫停播出有關美國的電影、音樂、廣告；5 月 11 日中共下令禁止公職人員、工人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加反美示威遊行，獲准的遊行過程要慎防過激行為；5 月 12 日中共下令全面禁止民眾進入美國使館區內遊行，並開始限制媒體有抗議活動的報導。在中共開始管理民族主義情緒後，中國各地激烈的反美抗爭活動漸漸銷聲匿跡²¹。

同時中共開始操作中國民族主義，試圖塑造中國政府與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唯有緊隨黨中央的領導，將愛國心轉為日常工作的動力，才能達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以藉此鞏固其政權合法性。5 月 13 日江澤民發表講話，強調中國人民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爆炸案後仍要堅持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將堅強團結，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²²；5 月 14 日黨媒《人民日報》刊登《向三位英雄的新聞工作者致敬》一文，將爆炸案中不幸罹難的 3 位中國記者歌頌為烈士，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是黨和人民的驕傲，未來中國人要繼承他們的遺志，學習他們的公而忘私、恪盡職守的情操，作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力量²³；5 月 20 日黨媒《人民日報》刊登《把愛國熱情融入到本職工作中，旅遊行業穩定客源確保遊客安全》一文，內容以旅遊業為例，要求民眾須堅守崗位，將強烈的愛國心融入到工作中，以確保客源市場²⁴；5 月 27 日黨媒《人民日報》刊登《凝聚在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下

²¹ 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新北市：韋伯文化，2009 年)，頁 355~356。

²² 江澤民，「在歡迎我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愛學術**，1999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static.ixueshu.com/document/df79d37cc467dbb9667c5ec9c4a63cc5318947a18e7f9386.html>。

²³ 「向三位英雄的新聞工作者致敬」，**人民日報**，1999 年 5 月 14 日，<http://p8080-data.people.com.cn.autorpa.lib.nccu.edu.tw/directLogin.do?target=101>。

²⁴ 「愛國熱情融入到本職工作中，旅遊行業穩定客源確保遊客安全」，**人民日報**，1999 年 5 月 20 日，<http://p8080-data.people.com.cn.autorpa.lib.nccu.edu.tw/directLogin.do?target=101>。

一由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引起的思考》一文，內容首先讚揚江澤民等黨中央的「處變不驚、運籌帷幄、果斷採取一系列重大決策與措施」，完全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與人民的要求，強調黨中央具有駕馭內政外交的非凡能力與處理各種複雜局面的高超藝術，文末再度要求中國人民要堅決擁護黨中央，堅持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²⁵。

在中共系列的政治操作下，民間高漲的反美情緒僅維持數日即平息，並無發生進一步衝突事件，同時也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恪盡職守，才能化悲憤為力量，共同打造現代化國家建設，為未來向美國等西方國家抗衡做準備，藉此鞏固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地位。

(五) 綜合評析

自冷戰結束以來，由於美國種種對中國的打壓舉措，導致中國民族主義一直在高漲，中國駐南斯拉夫爆炸案成為了引爆點。在中共的默許下，事件發生後幾日，中國各地爆發激烈的反美遊行示威運動，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中國民眾幾乎瘋狂失控，不但高喊著要美國等北約國家血債血還，甚至包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拼命丟擲物品與焚燒東西，讓美國大使及使館人員只能待在館裡，形同人質，同時部分民眾對中國政府的處置亦有所不滿，引發不小的質疑聲浪，自此，整場反美示威運動已逐漸開始不受中共掌控，故中共乃採取系列政治手段，制約相關示威行為，並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最終反美示威運動順利落幕，中共也成功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地位，解除了反美情緒可能失控進而挑戰中國政府的危機。簡言之，中共在爆炸案後成功利用民族主義來鞏固政權合法性，並引導了民間反美的高漲情緒，避免失控超出其所設定的底線。

²⁵ 「凝聚在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下—由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引起的思考」，人民日報，1999年5月27日，<http://p8080-data.people.com.cn.autorpa.lib.nccu.edu.tw/directLogin.do?target=101>。

第二節 維護社會穩定

一、中共操作民族主義維護社會穩定

社會穩定是指整個社會運作相對穩定、社會法規與保障體系相對健全、人民物質與精神需求相對滿足的狀態，唯有社會穩定後，才能確保社會進一步的可持續發展²⁶。其中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社會風險」，具有廣義與狹義的分，廣義的社會風險是指與政治、經濟有關的風險，包括政府施政不佳、失業問題、結社群鬥、宗教衝突等各項風險；狹義的社會風險則指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子系統對社會大系統的依賴，任一子系統的風險所造成的社會不安與動盪，均可能成為社會風險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²⁷。

對中國領導者而言，社會穩定是最重要的政治目的與至上的價值，任何價值均不能與之衝突，任何有牴觸的均應該被犧牲以保障社會穩定，意即「穩定壓倒一切」²⁸。然而，中國自冷戰後進入大規模的體制轉型時期，諸多既有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轉型過程中逐漸凸顯、放大，增加中共治理的難度，包括：

(一) 民族團結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多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生活水平已有提升，然而仍面臨群眾經濟壓力過重、權益未完全得到保障、經濟文化與發達地區差距持續拉大、當地幹部素質低落引發糾紛與對立、少數民族宗教習慣與風俗習慣未得到尊重等問題，均嚴重影響民族地區的團結與整體社會穩定²⁹。

(二) 社會分化

社會分化是指社會結構系統不斷分解、重組產生新的社會要素，最終形成新的結構的過程，主要有社會異質性增加與社會群體間差距拉大等兩種現象。中國

²⁶ 毛鋒，「論社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0年)，頁18~19。

²⁷ 陳靜，「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探析」，*社會保障研究*，第3期(2010年)，頁97。

²⁸ 胡傳勝，「社會穩定的概念分析」，*思想的境界*，<https://blog.boxun.com/sixiang/huchuansheng/05.html>。

²⁹ 段超，「當前影響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因素分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3年)，頁32~34。

改革開放後，整體社會結構在區域、領域、組織、階層、利益與觀念上均發生快速的分化，而傳統社會又無法適應此種劇烈變化，導致在中國轉型過程中出現嚴重的錯亂，對社會穩定造成重大的影響³⁰。

(三) 階層固化

階層固化是指與社會流動相對的非正常狀態，包括個人一生的職業地位沒有改變、子女與上一代相比，職業地位也沒有改變等，所謂「富二代」、「官二代」即為最佳寫照。隨著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階層固化現象不易形成公正、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且不同階層的間的隔閡亦持續加深，逐漸加快階層固化的趨勢，不但加大了社會的張力，亦積累了不同階層尤其是社會底層與中高層的間的利益矛盾，最明顯的現象就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態，為中國的社會穩定埋下不小隱憂³¹。

(四) 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是指群眾全盤否認政治菁英的社會價值，認為要極大彰顯大眾權利，包括在政治上強調直接民主，在經濟上主張平均公平，在價值觀上強調大眾至上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面臨政治體制、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社會階層變動以及網路技術快速發展等現象，導致了社會矛盾激化，在過程中逐漸形成民粹主義，其中以政治民粹主義最為活躍，由於部分群眾因改革轉型而感覺被剝奪感強烈，憤懣情緒高漲，乃透過網路大量宣洩對政治菁英的不滿，甚至推動網路政治走向街頭政治，引發大規模集體行動，隨著網上與網下的間的聯動程度不斷加大加深，逐漸對中共維穩與中國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³²。

上述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冷戰後的中共體制轉型期間不斷放大，群眾開始對共產政權治理產生懷疑，稍一不慎恐引發大規模社會不穩事件，對此，中共亟需一

³⁰ 文軍、朱士群，「社會分化與整合及其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影響」，**理論與現代化**，第 12 期(2000 年)，頁 21~22。

³¹ 馬傳松、朱橋，「階層固化、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重慶社會科學**，第 1 期(2012 年)，頁 36~37。

³² 袁婷婷，「民粹主義的中國境遇」，**探索**，第 1 期(2018 年)，頁 94-95。

套新論述來取代舊有社會主義，以重新說服民眾支持，此時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學開始被重新重視，其維護社會穩定與維護國家統一的核心思想剛好符合中共所需，中共乃開始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與整合的新資源，例如透過內在良知的憂患意識，「求仁得仁」、「自強不息」、「為仁由己」的自主性，「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等內涵，作為中國進行近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依托點，並成為民族成員安身立命的基礎³³；或著利用儒學「仁愛禮讓」、「崇尚適度」、「推己及人」等理念，來完善國家的制度和政策，將個體的利益差異控制在公平合理的範圍內³⁴，以緩解社會的不安問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

從實際例子來看，冷戰後中共領導人開始積極推動孔子地位的歷史回歸，明確表達對孔子的敬意，以作為凝聚社會向心力的重要工具，用以維護社會穩定，例如江澤民於 1989 年 10 月在「孔子誕辰 2540 週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強調，「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國的珍貴的文化遺產。對於孔子思想中一切好的東西，我們都要很好地繼承學習」，此為中共領導人首次公開發表有關孔子的談話，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胡錦濤則從儒學思想中提取「和諧」理念，以倡導「和諧社會」作為其施政綱領，並開始向全世界推廣孔子學院；習近平則於 2014 年 9 月在「紀念孔子誕辰 2565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強調，「儒家思想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對傳統文化中適合於調理社會關係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宣揚，賦予其新的涵義』」³⁵。

³³ 蕭功秦，「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戰略與管理**，第 4 期(1994 年)，頁 23~24。

³⁴ 張自慧，「以儒家元典思想涵養核心價值觀」，**人民網**，2014 年 9 月 29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29/c40531-25757423.html>。

³⁵ 關嶺，「從江澤民時代到習近平時代孔子加速走上神壇」，**多維新聞網**，2019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57519/%E4%BB%8E%E6%B1%9F%E6%B3%BD%E6%B0%91%E6%97%B6%E4%BB%A3%E5%88%B0%E4%B9%A0%E8%BF%91%E5%B9%B3%E6%97%B6%E4%BB%A3%E5%AD%94%E5%AD%90%E5%8A%A0%E9%80%9F%E8%B5%B0%E4%B8%8A%E7%A5%9E%E5%9D%9B>。

綜上所述，冷戰後中共利用逐漸融入儒學傳統精神的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凝聚社會向心力的重要工具，用以維護中國社會穩定，然而此論點僅為各家說法，尚欠缺實際案例驗證，以下將利用案例來驗證中共運用民族主義有無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並據此綜合評析。

二、案例探討—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

近代以來，梁漱溟、盧作孚、晏陽初、彭禹廷、黃炎培、陶行知、梁仲華、王鴻一等多位學者認為，文化是民族的生活樣法，就好比一棵生命之樹，其根幹在鄉村建設，若要解決中國根本性問題，首先就要解決鄉村問題，故上該學者試圖透過改造鄉村來改造中國，以儒學為本，提出一套完整的鄉村文化建設方案，期能透過鄉村的現代化帶動中國走上現代化之道路，讓中國生命之樹的老根上發出新芽，「鄉村儒學」乃應蘊而生³⁶。簡言之，中國鄉村發展與民族發展息息相關，唯有解決鄉村問題，才能維護社會穩定，讓中國國力發展順遂。

(一)「鄉村儒學」成立背景

「鄉村儒學」是指透過儒學講堂、禮樂教化、普及國學、孔子學堂、朗讀經典、道德講堂等富含儒學精神的教育方式，使村民能真正瞭解儒家文化的為人處世之道及忠孝廉恥、仁義禮智信等儒學核心價值，成為村民的安身立命之道與生活指引，期能實踐安立世道人心、提升村民素養、改善鄉村文化現狀、復興儒學、弘揚傳統文化等目標³⁷。

「鄉村儒學」的成立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因工業化、城鎮化、商業化的發展帶動中國體制的轉型，嚴重衝擊鄉村社會，導致鄉村治理的問題不斷放大，替社會不穩定埋下隱憂，具體包括：

³⁶ 顏炳罡，「『鄉村儒學』的由來與鄉村文明重建」，中國孔子網，2020年1月9日，http://www.chinakongzi.org/xsyj/xmcg/202001/t20200109_205246.htm。

³⁷ 龐景超，「當代中國鄉村儒學的訴求、收穫與瓶頸—以山東鄉村儒學為例」，愛知論叢，第103號(2017年)，頁60~61。

1. 鄉村人口大量外流

由於城鎮的工作發展機會較多，鄉村青壯年相繼入城移居，而留在鄉村的老人、婦女、兒童無人照顧，導致鄉村社會不斷解體，鄉土儒學的社會基礎被抽空，廟會、社戲、民俗活動等傳統鄉土文化活動逐漸消失。

2. 村落加速消失

據中共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自然村共有270萬個，相較2000年時的360萬個自然村，10年內共減少90萬個自然村，相當每日減少約250個自然村。

3. 鄉村教育弱化

中國農村在2000年至2010年間，平均每日消失30個教學點、3所初中、63所小學，等於每一個小時，4所農村學校就會消失。

4. 傳統優良禮樂教化斷失

受到「破四舊運動」、「文化大革命」、市場經濟衝擊等影響，導致諸多廟宇、宗祠、鄉賢祠等傳統教化的地方遭到嚴重毀壞，鄉賢、宗長教化體係不存。

5. 重商重利思想導致民風不樸、人心渙散

改革開放後所興起的商業功利主義、投機思想對鄉村民眾影響越深，侵害了由長遠歷史所形成的鄉村純樸敦厚之民風，導致鄉村出現了諸多不禮不信、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等現象³⁸。

6. 家庭倫理喪失

傳統鄉村重視家庭倫理，其中以孝道為先的儒家倫理成為維繫家庭的重要價值，然而近年家庭倫理價值陸續被打破，導致毆打與遺棄老人、老人自殺等諸多家庭問題³⁹。

7. 社會責任感弱化

由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功能弱化，農民對其生存依賴相對減少，導致農村

³⁸ 柳河東，「鄉村文明重建與儒學復興系統工程」，中國當代儒學網，2015年3月10日，<http://www.ccrx.org/ddrx/html/?7080.html>。

³⁹ 趙法生，「鄉村儒學的緣起與意義」，儒家網，2016年6月13日，<https://www.rujiarz.com/article/8369>。

基層組織難以再發揮凝聚農民向心的功能，另外隨著農民的小農意識與社會發展而產生的公民權利意識相繼抬頭，促成了農民對個人利益的強烈訴求⁴⁰。

中國 2018 年總人口近 14 億人，其中農村人口占比高達 40.42%，⁴¹前述鄉村治理的問題若沒有妥處，可能引發大規模社會不穩事件，然而過往用於說服農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歷經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大規模體制轉型等事件後，已無法再有效爭取他們的支持，甚至開始懷疑其執政合法性，對此，中共乃開始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與整合的新資源，「鄉村儒學」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

(二)「鄉村儒學」具體實踐

2008 年 10 月，在山東各級政府的支持下，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臺灣大學、哈佛大學、首爾大學等多所國內外院校學者共同發起，在孔子誕生地尼山正式成立「尼山聖源書院」，開展了文化交流、理論研究、培訓普及等各項工作，期能成為國內外儒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與復興中華文化的高地⁴²。

2013 年 1 月 16 日，尼山聖源書院在聖水峪鎮建立了第一個鄉村儒學講堂，學員主要為北東野村村民，從此揭開了鄉村儒學實驗的序幕。隨著鄉村儒學講堂持續展現成果，在一年多後，其規模也拓展到濰坊、濟寧、聊城等地。2014 年 6 月 21 日，山東省委宣傳部與光明日報社在尼山聖源書院舉辦「山東鄉村儒學現象」座談會，探討了因鄉村儒學講堂的成功而逐漸形成的「山東鄉村儒學現象」。2015 年 7 月，山東省共有 9 個地市開展鄉村儒學講堂，包括濰坊、濟南、濟寧、日照、聊城、菏澤、臨沂等，覆蓋大半個山東。2016 年，鄉村儒學的發展持續在山東推廣，同時也逐漸向北京、河南與湖北等省市拓展⁴³。目前山東省正在加快

⁴⁰ 杭麗華，「鄉村文化生態建設：對鄉村儒學現象的思考」，**開發研究**，第 3 期(2015 年)，頁 27~30。

⁴¹ 董峻、楊靜，「70 年，中國農民佔比少了五成」，**新華網**，2019 年 9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03/c_1124954730.htm。

⁴² 「尼山聖源書院簡介」，**尼山聖源書院官網**，<http://www.nssysy.com/a/syjj.html>。

⁴³ 龐景超，「當代中國鄉村儒學的訴求、收穫與瓶頸—以山東鄉村儒學為例」，**愛知論叢**，第

城鄉儒學講堂建設，進一步完善「圖書館+書院」模式。截至 2017 年 2 月，山東省內鄉村(社區)儒學講堂達到 9,200 多個，且公共圖書館亦全部建成尼山書院，共舉辦了各類活動逾 4 萬場次，參與鄉村群眾超過 500 萬人次⁴⁴。

由於鄉村儒學的教育對象多為文化程度不高、年齡上下分布廣的農民，在教學實踐上需採取因地制宜、深入淺出的方式，才能較好推動鄉村儒學工作，其具體方式包括⁴⁵：

1. 建立志願講師團隊

包括在職老師、企業人士、退休幹部、退休老師等，均為自發性的為村民講課，同時除了講課外，也會透過給兒童買些小禮物或文具，給村民買錄音機等生活用品、中秋節時發月餅等行動，拉近與村民的關係，對鄉村儒學的開展發揮了關鍵作用。

2. 建立定期化的鄉村儒學講堂

鄉村儒學講堂每半個月舉辦一次，在月中與月底的禮拜六，形成了一套常態化的學習制度。

3. 建立鄉村儒學的傳播體系

主要由課堂與課外等兩部分構成鄉村儒學傳播體系的內容，包括：(1)學經典：講讀的經典為淺顯易懂的善書、聖書，善書是中國傳統的勸善經典，聖書則是儒家經典；(2)習禮樂：從最基本的生活禮儀教起，每次上課前，要求兒童必須向長輩鞠兩個躬，然後在場所有人再站起來向孔子鞠四個躬，同時也請專家給民眾講授關於冠禮、成童禮、喪禮、婚禮、射禮等儒家禮儀；(3)行孝道：除了講孝道外，最重要的是要實踐孝道，故不斷從村裡尋找孝道典範，表彰他們並讓其介紹行孝的經驗與心得，期能發揮示範效應，同時也給聽課的兒童出有關孝道的作

103 號(2017 年)，頁 66~67。

⁴⁴ 蘇銳，「山東建成鄉村儒學講堂逾 9200 個」，新華網，2017 年 2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shuhua/2017-02/15/c_1120469314.htm。

⁴⁵ 趙法生，「鄉村儒學的緣起與意義」，儒家網，2016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rujiarz.com/article/8369>。

業。

4. 立鄉約

鄉約是中國傳統鄉村自治的主要依據，近年來多已遭拋棄，僅剩部分村子仍在實施，然而多為硬性的法律規定，並沒有心性、人心的啟發。儒家的鄉約是建立在自我省察的基礎上，因此選擇部分村子做鄉約試點，期望能將鄉約成為村民砥礪道德與人生向上的重要手段。

5. 助社會

志願者們常常到村民家裡聊天，關心生活起居，幫忙救助失學兒童，照顧困難老人的生活，逢年過節慰問困難家庭，同時成立「安懷基金」，除了志願者的捐款外，也發動村民捐款，期望能讓更多老人與兒童能受益。

6. 營氛圍

在試點村子裡，每日早上定時播放《弟子規》以及《婆婆也是媽》、《感恩一切》等孝道歌曲，並舉辦評比活動，讓村民投票選出模範婆婆、媳婦、家庭，另根據村民的要求，請劇團來表演文化節目，尤其有關傳統文化、孝道、家庭倫理的節目，相當受村民的歡迎。

(三)「鄉村儒學」具體成效

經過幾年的推行後，鄉村儒學已取得初步成效，產生了移風易俗的社會效果，並發揮了儒學對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具體表現在：

1. 促進社會基層的穩定與和諧

儒家思想旨在透過提升民眾素質，讓他們在大義與私利的抉擇上，能做到以公共利益為重，這就是儒家教化功能的所在，有助社會安寧統治穩定。本次透過鄉村儒學的實踐，使鄉村家庭更加和睦溫暖，社會呈現出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聖水峪鎮孟書記說：「從全鎮看，治安案件同比下降了 18%，2014 年上半年信訪案件下降 35%」，顯示儒學對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貢獻⁴⁶。

⁴⁶ 張穎欣，「何謂『鄉村儒學』—以尼山聖源書院『鄉村儒學』教化實踐為例」，人文天下，第 11 期(2014 年)，頁 18~19。

2. 改善社會風氣，強化政府治理

鄉村儒學重新樹立了孝道的風氣，改善了整個鄉村的社會風氣，包括村人已沒有人敢公開不孝敬老人、贍養老人，酒後鬧事、亂倒垃圾、偷搶的情況大幅減少，同時也改善了鄉村民眾與幹部間的關係，讓政治開展相關工作更加順利⁴⁷。

(四) 綜合評析

中國自冷戰後進入大規模的體制轉型時期，階層固化、社會分化等既有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轉型過程中逐漸凸顯、放大，增加中共治理的難度，其中鄉村治理涉及到廣大農業人口的生活與照料，稍一不慎恐引發大規模社會不穩事件，然而過往用於說服農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歷經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大規模體制轉型等事件後，已無法再有效爭取他們的支持，甚至開始懷疑其執政合法性，此時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學開始被重新重視，其維護社會穩定與維護國家統一的核心思想剛好符合中共所需，中共乃開始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與整合的新資源。在 2013 年透由尼山聖源書院首度舉辦「鄉村儒學」活動後，試點村落確實產生移風易俗的社會效用，村民瞭解了應有的禮儀規範與社會責任感，社會風氣大大改善，有效促進社會穩定與有序發展，同時也能讓政府推展工作更加順利，證明了儒學對社會教化與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簡言之，中共在本例子中利用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來維護社會穩定，降低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第三節 建構大國形象

一、中共操作民族主義建構大國形象

建構大國形象是指國家憑藉自身強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綜合實力，向外國展現威勢的行為。中國歷史上曾是世界最強盛、最文明、最繁榮的國家，在明朝時甚至派遣鄭和七度下西洋，到世界各國建構大國形象，其強盛的主要原

⁴⁷ 趙法生，「鄉村儒學的緣起與意義」，**儒家網**，2016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rujiarz.com/article/8369>。

因是擁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軸，相容了道家、佛家、法家等各派學術觀點，並吸收了部分外來文化，成為了堅實、深厚的文化體系，成就數千年的輝煌歷史⁴⁸。在此歷史背景的發展下，文化民族主義逐漸形成，成為中國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主要內容。

文化民族主義是由共同祖先與土地的根源構成了其核心內涵，是較為自我封閉的民族意識，強調族體的親合性及國家的地緣性，其蘊含之維繫力量主要來自傳統、道德、習俗、宗教等價值，能彰顯民族之特殊性與文化的一致性，進而擴大與其他文化差異，然而卻可能導致更多衝突，其基本特徵如下⁴⁹：

- (一) 文化資源將用來塑造民族價值與國家精神，並作為烏托邦精神與政治理想主義的替代品。
- (二) 強調民族文化與價值的特別性，由於主要靠國家系統來推廣，故逐漸形成一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系統。
- (三) 由於道德、宗教、傳統、習俗支配了民族的價值觀，逐漸激發出己身的特殊主義心態，恐將成為文明衝突的根源。
- (四) 堅持「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原則，培育民族優越感，以支配地緣政治、經濟與生活模式。
- (五) 民族共同的宗教、土地、祖先等因素，均構成民族認同的基礎，並成為社會動員的基本力量。
- (六) 主要維護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迫使民眾遵守單一的社會理念與秩序。
- (七) 道德認同成為民族認同的唯一標準與最高理念，以確保民族內部的純潔性。

文化民族主義主張提倡民族精神，宣揚愛國主義，向外展現民族的自信心與驕傲，那麼中國要如何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來宣揚愛國主義？答案是憑藉自身源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中國人視歷史與文化為最寶貴之民族的根與國粹，強調要

⁴⁸ 邱明正，**中華的智慧：中華文化的源泉，東方智慧的精髓**(臺北市：時報出版，2018年)，頁15~16。

⁴⁹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的緣起及主要特徵」，**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7年)，頁42~43

保存國粹，研究國學，才能彰顯自身的歷史使命感與愛國情操。另外中國人強調中國文化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因為其地理上山海阻隔，對外沒有交通可以連通，難以與外面文化交流，故與其他的希臘、埃及、印度、巴比倫的世界古文明發源地不一樣，凸顯了中國文化的獨創性，已有與西方文化並列之態勢⁵⁰。

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傳統主張華夏中心主義，即使它於 20 世紀初開始逐漸式微，然而部分中國人對中國文化仍保持強烈的驕傲感，認為中國文化是世上最優的文化，故逐漸形成新的中國文化主義，期望能以中國文化拯救陷入物質疲憊的西方文明，最終能讓全世界走上中國的道路⁵¹。

冷戰後的中國文化民族主義，開始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工具，主要是因為此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遏制中國的實力崛起與擴張，乃醞釀出「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論點，對此，中共乃開始重視「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運用，而不再一味使用「剛性權力」(Hard power)與西方國家正面衝突，在柔性權力的應用上，乃運用儒家文化中蘊含的「和平」、「仁義」、「德治」等意涵，透過政治操作向國際進行大量的文化行銷，以消弭國際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敵意，重塑中國對外文化利基與和平形象，與中共向來強調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主張相呼應，其中最具體的措施為在各國大量建立「孔子學院」，由教育部負責指導，其轄下的國家漢辦負責推動學院相關業務，主要任務為推廣中華傳統文化向海外輸出，以及作為中西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溝通平臺，透過開展漢語教學、培訓教師、文化交流等工作，期能擴大中國文化在國際的文化影響力，傳達中共的政治價值觀⁵²。

同時隨著中國的國力與經濟大幅成長，中國開始認為自己就能代表亞洲來弘揚東方的亞洲文化，主張以「亞洲價值」的東方民族主義形式展現，並以「振

⁵⁰ 鄭師渠，「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歷史研究*，第 5 期(1995 年)，頁 95~96。

⁵¹ 俞祖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類型、格局及主導價值」，*齊魯學刊*，第 2 期(2001 年)，頁 50~51。

⁵² 楊以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7 年)，頁 24~46。

興中華」作為主要的口號⁵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中共前總理李鵬於 1996 年 9 月 4 日在中共政協所舉辦的「展望二十一世紀論壇」，發表名為「中國的發展和亞洲的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的講話，內容強調「中國是亞洲的一員，中國同亞洲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亞洲，亞洲的發展也需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中國；亞洲的安全問題，要由亞洲國家和人民來解決，外部勢力的介入，往往於事無補，有時甚至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充分重視亞洲優秀文化傳統在促進和平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東亞文明正在給人類新的啟迪」⁵⁴，等於在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宣示，在文化上「中共代表中國，中國代表東亞，東亞代表亞洲」，並將亞洲文明提高至普世性價值的地位⁵⁵。

綜上所述，冷戰後隨著中國實力迅速發展，開始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透由「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文化論述攻訐，以遏止中國發展，對此，中共乃開始運用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工具來應處，然而此論點僅為各家說法，尚欠缺實際案例驗證，以下將利用案例來驗證中共運用民族主義有無發揮建構大國形象的功能，並據此綜合評析。

二、案例探討—成立「孔子學院」

中國民族自古以來對自身文化保持強烈的驕傲感，其中以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認為是世上最優的文化，應該要讓中國文化拯救陷入物質疲憊的西方文明，讓全世界都走上中國的道路⁵⁶。簡言之，中國民族渴望將自身優越文化無遠弗屆傳播出去，其具體方式之一即為「孔子學院」，希冀全世界能接受中國文化，進而接受中國民族崛起之事實，不再讓西方文明壟斷世界文化價值觀，以逐步建構大國形象。

⁵³ 劉性仁，「中國大陸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概念性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93 期(2009 年)，頁 142~143。

⁵⁴ 李鵬，「中國的發展和亞洲的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中國政協新聞網**，2005 年 9 月 4 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51372/51376/51493/3599646.html>。

⁵⁵ 同註 51。

⁵⁶ 同註 51。

(一) 「孔子學院」成立背景與宗旨

中共近年積極推動軟實力戰略以建構大國形象，在選擇上，由於政治價值觀與外交政策等軟實力操作難度、成本高，且效益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凸顯，而文化吸引力則相對操作單純化與成本低廉，故中共乃以儒家文化列為優先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將其導入於軟實力的戰略框架中，轉化為重要政策操作工具與可利用資源，孔子學院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⁵⁷。

孔子學院的宗旨是向全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更具體來說，是儒家思想中具有世界價值與現代意義的內容。儒家思想中的仁義道德、以德治國、仁者愛人、道德教化等思想是中國文化延續至今不斷產生生命力的源泉之一，也是中國重要的民族精神，在西方國家面臨國際局勢混亂、價值觀矛盾甚至戰爭危機等情勢下，原有西方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價值思想無法解決上述問題，故孔子學院的文化傳播首要突出儒家思想的仁、德、和等元素，並將其發展為世界性的價值思想體系，為世界尋求不同文化間的和諧相處提供一套理論工具⁵⁸。

(二) 「孔子學院」運作模式

孔子學院由中共教育部負責指導，其轄下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負責推動學院相關業務。孔子學院總部設立在北京，海外的孔子學院分部採取中外合作方式的模式來運作，課堂所需的硬體設備由當地國負責籌措，而中共則主要提供師資、教材、軟體等內容。在經費支出上，一開始在設立之初，先由中共投入一定金額的啟動經費，在孔子學院開始運作後，則由中共與當地國共同籌集經費，一般而言都是以均分為原則。孔子學院的主要業務計有培訓漢語教師與提供漢語教學資源、開展漢語考試與漢語教師資格認證業務、面向社會各界人士開展漢語教學、開展當代中國研究、提供中國教育、文化、經濟及社會等資訊諮詢等 5 項⁵⁹。

⁵⁷ 楊以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7 年)，頁 38~39。

⁵⁸ 吳瑛，「對孔子學院中國文化傳播戰略的反思」，**學術論壇**，第 7 期(2009 年)，頁 140~141。

⁵⁹ 楊以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7

(三)「孔子學院」具體成效

自 2004 年第一個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設立迄今，全球已有 162 國家和地區設立了 541 所孔子學院與 1,170 個孔子課堂，其中，亞洲共有 39 國(地區)，共設立了孔子學院 135 所、孔子課堂 115 個；歐洲共有 43 國(地區)，共設立了孔子學院 187 所、孔子課堂 346 個；美洲共有 27 國，共設立了孔子學院 138 所、孔子課堂 560 個；大洋洲共有 7 國，共設立了孔子學院 20 所、孔子課堂 101 個；非洲共有 46 國，共設立了孔子學院 61 所、孔子課堂 48 個。其數量規模之大，顯示孔子學院在全球已具一定品牌影響力與代表性，成為各國瞭解中國儒家文化的重要場所⁶⁰。

孔子學院的全球佈局已經成形，各地孔子學院在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則下，多能瞭解、融入當地國的國情、禮節、信仰、習俗等傳統文化內容，配合推出系列適宜的教育課程，基本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⁶¹：

1. 漢語教學課程

孔子學院會邀請當地國大學生、研究生、政府官員、教師、企業家等不同種類人士，加入其設立的各種類型之漢語課程，包括可獲學分的漢語選修課程、非學歷的漢語培訓課程，以及本科、專科、碩士學位的漢語學位課程。

2. 中小學漢語教師培訓

為了滿足當地孔子學院的教育工作需要，孔子學院乃透過開展短期講座、專業證書、中外合作等培訓模式培育師資，課程注重實用性教學，學員時常需要進行實際演練，例如在結業時要繳交一份備課計畫，並要為大家展示最為精彩的部分。

年)，頁 39~40。

⁶⁰ 關於孔子學院/課堂，**孔子學院官網**，2020 年 3 月 24 日，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⁶¹ 徐麗華，「孔子學院的發展現狀、問題及趨勢」，**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08 年)，頁 26~28。

3. 全方位、多層次、多形式的活動

孔子學院相當注重文化活動的開展，故近年陸續推動系列文化活動，期能讓全球能更瞭解中國文化，主要活動包括：一是開設中華文化的特色課程，全面介紹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藝術、外交、風俗、中醫、習慣等項目；二是舉辦豐富多元的文化活動，各地孔子學院會利用中國春節、元宵、端午、中秋節等傳統節日，舉辦系列食物品嚐、藝文演出與專題講座等活動，讓外國人能充分瞭解中國文化內容，進而感到興趣想去學習，逐漸激發學習漢語的熱情；三是開展學術研討會，透過學術活動擴大孔子學院的影響力，提高了在當地國的學術地位，例如加拿大孔子學院聯合舉辦了中加兩國作家交流會，在文學藝術領域促進了中加兩國的交流、美國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辦「文化橋樑」研討會，促進了雙方的文化交流。

孔子學院有助中共展現文化主權，建構大國形象，其具體表現在 3 方面⁶²：

1. 文化吸引力

孔子學院主要目標為強化中國文化吸引力，故積極在海外建立教學基地，作為中外文化交流與對話的重要平臺，並執行著向海外推廣中華文化的任務，中共期望最終能將中華文化形成全球文化網路，俾利提升中國在西方強勢文化中自有文化品牌的地位與價值，擴大其文化影響力。

2. 政治價值觀

孔子學院除推廣中國文化外，亦能發揮傳達中共政治價值觀的功效，例如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路線，不走霸權路線的政治價值觀，期能逐漸形塑中國在全球的正面形象。

3. 外交政策

孔子學院由於深入當地，能作為中共推展外交工作的第一線，進行當地的文化行銷與語言傳播，以提高中共在當地的影響力，發揮與正式外交工作的互補作

⁶² 楊以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7 年)，頁 45~46。

用。

(四) 綜合評析

冷戰後儒家思想開始受到中國重視，其所蘊含的政治與文化意涵恰好符合中共領導層的需要，中共乃開始運用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工具，用以抵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透由「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文化論述的攻訐行為，在近年大力推廣孔子學院後，已取得階段性成效，逐漸反轉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上的不利局勢，消弭了國際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敵意，並能與西方文化抗衡，增加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簡言之，中共在本例子中利用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來建構大國形象，成功抵制西方國家的文化攻訐行為，並擴大了自身在國際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第四節 小結

從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整體國力雖大幅提升，然而卻面臨內部社會不穩、外部遭美國等西方國家打壓的不利局勢，增加中共社會治理與國際外交的困難性，故中共開始以民族主義為手段，試圖緩解、反制相關問題。

在案例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中，中共一開始默許民眾進行反美遊行示威運動，甚至允許群眾包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向使館內丟擲物品或焚燒東西，以適時緩和與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之後乃透過系列政治手段，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最終反美示威運動順利落幕，中共也成功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地位，解除了反美情緒可能失控進而挑戰中國政府的危機。

在案例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中，由於儒家思想的維護社會穩定與維護國家統一的核心思想開始受到重視，故中共乃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與整合的新資源，其「鄉村儒學」的試點村落確實產生移風易俗的社會效用，村民瞭解了應有的禮儀規範與社會責任感，社會風氣大大改善，有效促進社會穩定與有序發展，同時也能讓政府推展工作更加順利，證

明其對社會教化與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在案例成立「孔子學院」中，由於儒家思想蘊含的政治與文化意涵恰好符合中共領導層需要，中共乃開始運用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工具，用以抵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透由「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文化論述的攻訐行為，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效，逐漸反轉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上的不利局勢，消弭了國際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敵意，並能與西方文化抗衡，擴大了在國際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綜上所述，中共確實運用民族主義發揮出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達到有效轉移內部政治壓力，團結抗敵之目的，對於吾人瞭解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具有重要參考作用。



第肆章 中國民族主義的機遇與挑戰

本章主要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的機遇與挑戰，期能推測未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倘若持續高漲是否會對中共治理造成挑戰，甚至朝向極端民族主義發展，恐加劇區域緊張態勢；另分析臺灣問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探討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

第一節 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目標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整體國力大幅提升，其民族主義的目標亦較過往發生巨大改變，主要體現於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如次¹：

(一) 政治面

過往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於政府的腐敗、無能相當不滿，強烈批判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是國家積弱不振的主因，完全否定了既有政治權威與維護社會秩序的制度，因此逐漸形成較為激進的力量，成為扳倒當局或促進政治變遷的重要角色，其中以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民初「五四運動」最具代表性。

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則一改過往反當局的特性，認為必須強化、支持既有的政治權威與維護社會秩序的制度，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等諸多工作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有政治穩定的環境才能讓政府全力施行政策，既然如此就必須堅持擁護中央，確保政治穩定而不是對現行政治制度進行破壞性的大變革。

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能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功，可歸功於政府透過政治鎮壓而實現穩定與發展的環境，如此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環境，也足夠將既有政治制度合理化。另外冷戰後中共雖沒有公開宣稱要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抗，然而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卻

¹ 吳國光，「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五四時代與 90 年代的對比」，*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18~328。

希望政府能夠挺身對抗西方強權，主要是對西方主導的「單一全球市場」與「自由主義民主」的不滿，認為西方利益集團已透過這樣的體制搶占了優勢，對於中國在全球化的佈局相當不公平與不利，故希望政府能以共產主義對抗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期望能形成一套有別於西方的成功發展模式，達到「只有社會主義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的目標。

(二) 經濟面

過往的中國民族主義強調要尋求國家富強，主因是對中國清末民初的積弱不振、貧困落後、遭到西方列強欺侮的局面相當不滿，感受到強烈的屈辱與恥辱感，其中以 1919 年 5 月北洋軍閥政府準備簽署「二十一條」最具代表性，深深讓中國民族主義者感受到民族存亡的危機，進而爆發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主張要儘快使中國富強，自此中國乃踏上不斷追求國家富強的道路。

在經歷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後，中國終於逐漸富裕強大，成為崛起中的世界大國，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於國家的經濟成就感到自豪、驕傲與信心，主要可體現在 3 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充滿信心，尤其這模式並不是西方國家試圖引導、教導中國要遵守的模式，而是中國人自己努力開創出來的，另外由於西方列強時常憑藉制度優勢侵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套中國的發展模式剛好可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榜樣與利益；二是由於富裕即是光榮的物質主義態度，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已不再向過往自慚形穢，反而開始有些瞧不起，存有一種明顯的優越心態；三是隨著中國逐漸的崛起，西方國家應該學習將他們以前所糟蹋的中國接受為可平起平坐的強國，然而此舉在國際上難以被西方國家接受，因此未來中國要不斷打破、消除西方國家種種遏制舉措而繼續崛起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重點已不再是中國如何尋求富強、向西方學習，而是西方國家如何學習接受中國已是富強的事實。

簡言之，過往中國民族主義在經濟上的目標主要是在國力不振的背景下尋求自身的富強，而現今中國民族主義則是在已經富強的背景下，致力尋求主導現行

國際秩序的西方強權國家接受中國已經崛起的事實，並能公平對待中國不再採取種種遏制舉措。

(三) 文化面

過往的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批判與否定傳統中國文化，認為充滿種種缺失，故要進行傳統中華文化改造、重建才能對抗中國的西化，而不是致力維護傳統，其中以民初「五四運動」最具代表性，那時的知識分子，普遍都具有反傳統的傾向，認為文化改造乃是中華民族再造的基本任務之一。

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反而重視傳統中國文化，認為唯有傳統中國文化，才能夠消除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長期性社會弊病，且它不但能拯救中國，還能幫助全世界，成為人類未來文明的希望，可以說，通過長年下來的經濟發展所增長的中華民族自信心，已經溢出到政治與文化的領域，其中在民初「五四運動」中被批判慘烈的儒家思想，反而成為現今民族主義者眼中中國能夠富強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在承認共產主義已經喪失對中國人的吸引力的背景下，認為儒家思想能夠重新有效凝聚民族向心力，同時也能向全人類提供獨特的價值觀與精神資源，以消弭西方國家中存在的長期弊端，因此傳統中國文化不但為中國的資產，而是全人類的希望。

綜上所述，過往的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批判傳統政治制度與儒家文化的缺失，認為二者是導致中國經濟停滯、國力落後的主要原因，故要反傳統、反執政當局，並進行徹底社會變革才能讓國家再度富強。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雖經歷了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功，然而西方國家仍主導國際秩序，且開始對中國採取遏制措施，促使中國民族主義轉而從內部找尋政治合法性與精神文化資源來支撐中國的崛起，意即中國民族主義目標從「如何救國」轉變為「如何使中國成為世界強國」，而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態度則從「反當局」、「批判」轉變成「親當局」、「認同」，這樣的大幅改變並不是政治的懷舊現象，而是目前中國轉型與國際政治經濟體系

轉型的反映²。

二、中國民族主義的挑戰

在中國民族主義持續追尋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的目標中，由於屬後起之秀，勢將打破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格局，故自然引起西方國家的關注，中國威脅論乃應運而生，論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對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主要表現在 5 個方面³：

(一) 經濟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未來或將形成「大中華經濟圈」、「華人經濟圈」，逐漸從亞洲擴散至全世界，造就中國人在全球經濟的優勢地位，且由於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結構相似，勢將排擠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市場，另外中國時常以低廉的勞動成本優勢向全世界傾銷商品，卻禁止他國產品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造成了中國與全世界的貿易不平衡現象，各國因此失去大量就業機會，乃紛紛要求對中國惡意的貿易作為進行必要的懲罰。

(二) 文化面

西方國家將西方文明視為「普世文明」，試圖將西方價值觀作為普遍原則推廣至全世界，而在中國崛起進而逐漸擴張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後，西方國家自然視其為造成世界衝突與威脅世界穩定的根源，其中以杭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最具代表性，他認為未來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將取代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衝突而成為未來國家戰爭的根源，中國將聯合伊斯蘭國家對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挑戰，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

(三) 軍事面

西方國家認為中國軍費逐年快速增長，代表著中國極有可能運用武力來解決

² 吳國光，「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五四時代與 90 年代的對比」，*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29~330。

³ 陳岳，「『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一種『層次分析』法的解讀」，*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 3 期(2005 年)，頁 93~96。

邊界衝突等重大國際爭端，或將引發更嚴重國際衝突，同時隨著中國導彈與核能力技術的高速發展，勢將威脅東亞乃至全世界的國家安全利益，迫使國際與中國展開軍備競賽。

(四) 意識形態面

中國目前雖放棄了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卻仍反對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中國的崛起或將成為非西方意識形態的領袖，對西方價值觀構成挑戰，因此中國「非民主」國家的身分在先天上就已經是中國威脅論的必然邏輯。

(五) 生態面

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對於全球資源與能源的消耗量勢將大幅增加，進而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尤其中國製造業所排放的大量溫室氣體，將加劇氣候異常、全球暖化等環境問題，在中國的周邊國家更是首當其衝，另外中國為發展工業化而大量減少農耕土地，造成糧食生產量下降，而其人口數卻持續增加，中國勢將大量從外國進口糧食因應，此時全世界的糧食供給量萎縮與中國的需求膨脹將發生嚴重矛盾，導致全世界的糧食價格大幅上升。

綜上所述，中國民族主義在追尋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的目標過程中，將面臨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的最大挑戰，隨著「中國威脅論」的快速傳播，可能將迫使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處於被動的地位，不利於國家發展，對此，中國民族主義在這樣的國際劣勢下，必然要採取措施應對，方能突破「中國威脅論」的掣肘。

三、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

在「中國威脅論」充斥的國際關係體系，中國民族主義要能突破其掣肘，主要可能有「忠誠」、「退出」、「抱怨」等 3 種可能發展方向⁴：

⁴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 450~451。

(一) 忠誠

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中國不可能對現存國際關係體系保持「忠誠」，一來是中國近代以來的疲弱，無法參與現存國際關係規則的制訂，導致相關規則都是由西方國家確定的，中國人因此認為現存國際關係體系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反而會制約中國獲益，這也是中共領導人時常宣稱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因；二來則是中國人即使接受現存國際關係規則，但西方國家未必願意接受中國的崛起，反而會從中遏制，因為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崛起勢將對現存的國際權力分配構成挑戰，進而影響國際關係穩定。

(二) 退出

因為全球主義的興起，中國也不可能「退出」現存國際體系，一來是西方國家絕不允許中國退出國際體系，因為讓一個具相當國力且具有核武器實力的共產主義大國在國際體系之外是相當危險的；二來是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已被整合到世界經濟體中，發展出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因此中國難以貿然退出國際體系。

(三) 抱怨

在西方不接受中國的崛起、難建立自成一體的世界體系、無法退出現存國際體系等情況下，「抱怨」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應處現存國際體系的最佳選擇，長年下來，中國始終在「抱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積極呼籲要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希望能「改革」、「修正」現存國際體系，讓它更能接納中國的崛起與國家利益。

西方國家始終將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人對民主政治的要求對立起來，認為民族主義將取代中國人對民主政治的追求，然而從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可觀察，一旦受外在壓力而促成民族主義興起後，中國人對民主政治的要求反而降低甚至消失，但民主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並沒有存在矛盾，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在國際社會追求民族的利益與尊嚴，而它的形成過程恰好是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的過程，對中國人而言，當國家的尊嚴受到外來的力量威脅時，個人的尊嚴就難以得到保

障，個人的權利就要讓位給民族的權利，俾確保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能抗衡外國的侵略，因此，中國民族主義往往是對外在壓力的反彈，若西方國家保持良善對中政策就能安撫中國的民族主義，而若採取激烈、惡意的對中政策則將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很大部分取決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倘若中國最終成為具明顯的民族主義與排外傾向的大國，其責任將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而且也是西方國家的⁵。

第二節 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對中共治理的挑戰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

中國民族主義主要是在受到西方國家侵略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因此自然反對西方的侵略，然而矛盾的是，卻又不得不學習西方的長處才能增強國力，抵禦侵略，使得中國民族主義既要反對西方，又要將其融入主流文明之中，兩者的協調何其困難，實際上常常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迫使中國必須反對西方而非向西方學習，最終導致了盲目狹隘的排外。另一方面，在西方侵略下，中國民族主義無法承擔同時反對西方與反對國內專制的雙重責任，由於它需要文化與政治的精神寄託，以及一種身分與秩序，否則民族國家情感將漫無目的的肆意發展，故中國民族主義通常認同國內的專制統治秩序，帶有強烈的保守主義特徵，如此中國民族主義就具有激進排外走向閉關鎖國與肯定現存的政治秩序之融於一體的衝突性特徵。冷戰後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既承襲了傳統民族主義的精神氣質，亦體現出部分不同的問題。

第一，中國民族主義受西方壓力的影響，導致具有強烈地情緒化傾向。西方的壓力源自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侵略，然而多數民族主義者仍自然連結於歷史上中國遭西方侵略的痛苦記憶，因此視為資本主義所謀劃的政治陽謀，顯示仍未擺脫傳統地情緒化反應模式。而情緒化的民族主義

⁵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451~452。

具有盲目的、暫時的以及非理性的等特徵，帶有相當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強烈希望國家在軍事、外交方面必須加強軍備、反抗霸權，要敢於與西方戰鬥，這樣強烈地情感宣洩在現實上容易走到不切實際、徒具口號的吶喊，甚至是非理性的狂妄與自負。

第二，中國民族主義內容過於空洞化，常常無法提供有關國家建設的具體意見與解決方法，且過於強調國家本位，將其視為一個利益主體，而不考慮個人利益，導致中國民族主義往往表現出一種強烈地情緒與態度，但如何幫助國家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卻無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其中經濟發展取決於在經濟方面的持久動力，經濟中的單位是個人而非國家或民族，在中國民族主義缺乏對個人利益的關注下，僅談論虛無飄渺的民族利益是無法激勵個人為發展國家經濟貢獻心力，同時過分強調民族國家的權力，而忽視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亦與現代政治發展背道而行，雖然中國民族主義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有助於發展國家經濟，然而自身卻無法提供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具體方案。

第三，中國民族主義存有內在建設不足的問題，主要是它沒有從前現代的種族、文化的認同發展到民族國家的認同，沒有從本能的愛國主義發展到理性的愛國主義，反而以種族、文化的認同忽視以至取代民族國家的認同，過分強調本能愛國主義的高尚，以貶斥理性的愛國主義的功利化。此種轉變必須在民族國家的購艦過程中以民主方式來保障國內人民的公民權利，使其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其價值體系及目標。然而現實中的中國民族主義，反而徒有激情的愛國情緒，始終缺乏穩定、持久、為共同體的民眾所基本認同的社會制度、行為規範及社會制度，可以說只是一個空洞且巨大的符號。冷戰後的中國民族主義逐漸脫離公民社會建設，如此的民族主義所激發出來的情感愛國主義與民主社會的憲法愛國主義是不同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缺乏後者所具有的民主價值內容，且前者的國族認同十分需要以疆域界定來彌補內容的嚴重不足。中國民族主義的過度盲目、自

信及熱情的自我認同，反而凸顯自身的空虛與迷失⁶。

第四，中國民族主義是對國內問題的反應，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為大陸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卻也造成諸多負面的效果，因為當時改革的方向是分權，導致中央政府的能力尤其是經濟方面的能力大幅減弱，故自冷戰以來大陸持續針對此現象進行「國家能力危機」的討論。高速的經濟增長確實對舊的國家體制形成嚴重挑戰，若無有效措施應處，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生存恐會有問題，因此很多學者再次提出重建民族國家的建議，其中中國民族主義在這樣的環境中又成為當中之主要流派⁷。

隨著中國民族主義自冷戰後逐漸高漲，上述的不利問題勢將放大凸顯，進而對中共治理造成嚴重挑戰。

二、中國民族主義對中共治理的挑戰

就國內層面來看，中國民族主義為了要集中國內力量進行國家建設，自然沒有將重點聚焦於個人身上，忽視了公民權利，反而視個人為無差別的個體，沒有看到或著不願正視個人在權力與利益方面的重大差別，亦沒有注意到不同個人在對待國家制度時產生的不同態度，以及可能因而產生的認同危機。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對內只能虛構一個民族的整體利益，而完全忽視個人的利益，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就極有可能籠罩在民族利益的陰影下。⁸

另外，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也會導致重大的社會運動，進而對中國社會造成不穩定，由於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因亞洲金融危機而緩慢下了，而社會不穩定因素卻正在增長，給予了中國民族主義者一個很好的操作空間，部分政治上的活躍分子與城市知識份子開始蠢蠢欲動，積極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雖然中共自 1990 年代以來持續加緊了對日漸活躍的社會力量在政治上的控制，但實際

⁶ 任丙強，「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原因、特徵及其影響」，**學海**，第 1 期(2004 年)，頁 80~81。

⁷ 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81~382。

⁸ 同註 6。

上仍無法阻止社會力量對中共的挑戰，例如近年來中國各城市紛紛創立「中國民主黨」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另外在 1988 年末的一段很短時間內，共有 23 省市成立了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並向當地政府部門提出註冊申請。這也解釋了中共為何始終將穩定放在首要位置，由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向隨時會改變，可能最後強烈的情緒將轉向政府，因此只要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會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穩定，中共就沒有理由不參與其中進行管控，必須採取主動以便管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轉向政府⁹。

就國際層面來看，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情緒化口號若真的轉變成國家的對外政策基調，那麼其偏激的主張與缺陷可能導致相當嚴重的後果。由於中國民族主義本質上容易點燃民眾心中壓抑已久的情緒，在內外的巨大壓力下極有可能爆發出來，進而造成中國民族主義者始料未及的危害，尤其如果中國民族主義進入政策層面，那麼除將對中國周遭國家產生威懾外，亦會增加他們的不信任感與不安全感，從而加強軍備，導致亞洲的軍備競賽。因此，中國民族主義的政策極有可能造成群強環視、四面樹敵的不利國際局勢，然而這卻被中國民族主義者視為一種典型的「自我實現式的預言」¹⁰。

本文曾以「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探討中共運用民族主義如何鞏固政權合法性。由於美中關係自冷戰後逐漸惡化，在長年的持續爭鬥、缺乏信任與互動的情況下，引發了中國民族主義強烈的反美運動，在本案例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 5 枚戰斧式巡航導彈的攻擊，造成了人員的死傷，因此中國各地爆發激烈的反美遊行示威運動，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中國民眾幾乎瘋狂失控，不但高喊著要美國等北約國家血債血還，甚至包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拼命丟擲物品與焚燒東西，讓美國大使及使館人員只能待在館裡，形同人質，然而中共鑒於國力仍遠不及美國，故在對此事件態度上僅想冷處理解決，

⁹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445~446。

¹⁰ 同註 6。

但國內民族主義的高漲卻不容許中共讓步，在無奈下，中共僅能採取系列政治手段，制約相關示威行為，並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最後反美示威運動雖然順利落幕，中共也成功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地位，解除了反美情緒可能失控進而挑戰中國政府的危機，然而整起事件卻凸顯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嚴重制約中共外交決策的空間。

綜上所述，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對內必須採取主動管理方式來維護中國社會的穩定，避免其強烈情緒最終挑戰政府權威，此舉勢將增加中共維穩的成本，體現於近年來中共在維穩經費上的大幅攀升；對外由於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烈擴張性的特點，以及中國實力逐漸強大造成其他國家的極度不安全感，故最終可能在國際關係上遭到被敵視、孤立與遏制，被排除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而被迫走向封閉¹¹。此等因中國民族主義所引發的不利因素，增加了中共內外治理的難度與挑戰。

三、中國民族主義應導向於務實理性的民族主義

變動不居的社會環境造就了中國民族主義也會隨之發生相應變化。中國民族主義經歷了長年的歷史發展，雖然它仍存在沒有系統、不理性、不夠完善與成熟等問題，但蘊含其中的是一種對國家民族難得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無法推卸的責任。中國民族主義若要在中國歷久不衰且能蓬勃生機，就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對各種民族主義進行適當地引導，抵制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克服民族虛無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讓中國民族主義原有的偏激、被動型的特點逐漸走向自發、主動型，由情緒化、非理性轉向溫和、務實理性且融合自由主義思想的成分，形成一種適合中國民情的新型民族主義，以降低對中共內外治理的難度與挑戰。

第一，由偏激、被動、自衛型民族主義走向自發、主動、自強型民族主義。中國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主義思潮多與傳統民族觀念的影響有關，然而它的萌芽

¹¹ 同註 6。

與發展，實際上是對西方列強侵略的激烈反應，是在中國面臨生存存亡之際所催生出來的，故形成了一種自衛型民族主義。而冷戰後重新崛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雖然在表現形態上與近代民族主義有著諸多的不同，但從本質上來看，仍屬於一種自衛型民族主義，是受到外部刺激所產生的，並非中國自己生成的，也不是中國人自身訴求的一種主動反應。因此未來應更加關注中國民族內部的問題，置重於中華民族內部力量的整合，俾實現中國的自強。

第二，由情緒化、非理性轉向較溫和、務實理性民族主義。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都是在中國面臨危急存亡之際而產生的，民族主義者會藉此作為口號，激發民眾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而展開抵禦外敵的種種民族主義運動，然而在過程中往往失去理性，甚至發生抵制同屬人類文明的西方文明成果，最終導致兩敗俱傷的後果。反省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內容，對外的民族主義與對整個國際形勢的理解難以分開，中國民族主義需要適當的宣洩管道，然而給予民眾一個全面且公開的信息也是必要的，中國民族主義應該轉變成一個溫和且務實的民族主義，即使在國際上再度受到挫折也是如此，雖然反對崇洋媚外但也不致排斥外國，也不再抵抗或消極抵禦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而會是一種務實理性的合理反應。

第三，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融合。中國民族主義是由反對帝國國主義、殖民主義發展到反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政治思潮，其目的係爭取民族自決、民族獨立、建立民族主權國家並發展經濟文化，然而實際上中國民族主義至今仍無法提出該如何建設一個民主、正義的社會，但它對民主的政治建設、自由價值的追求矢志不渝。在現今自由主義的時代，中國民族主義將很難保持其原本的價致意義，而會根據中國的實際情境做出相應的調整，在強調集體利益的同時，也會重視個人正當權益，在國力越漸強盛之際，也會主動融入國際社會，在謀求民族自決時，將主張民族交融。簡言之，若中國民族主義能與自由主義加以整合，將能獲得新的發展意義¹²。

¹² 唐建兵，「芻議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嬗變與走向」，*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1期(2010年)，頁40~41。

整體來看，在全球化趨勢已成為一種趨勢的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參與與適應的問題，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確實構成了挑戰。由於中國民族主義尚沒有真正構建成為一種能夠凝聚民族精神、促進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力量，反而僅是一個政治行動，凸顯出中國民眾對於外來壓力的情緒化反應與空洞性的缺點，甚至有著武力崇拜的擴張性傾向，這些極有可能將中國的未來發展引向不可知的危險方向。

因此急需將中國民族主義導向於開放、和平的民族主義，而不是狹隘、尚武的民族主義。第一，在理論基礎上，必須消除極端社會進化論、生存空間理論等因素，必須以積極的開放心態來建構和平的民族主義；第二，中國民族主義必須落實到國內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建設與保障公民權利上，始能完成重要的現代國家認同；第三，在國際關係上，中國民族主義要能以和平的方式參與國際活動，在尊重國際規則的情況下，追求國家利益。

中國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未來的影響將是長久的，若能走向良性的發展道路，將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促進力量，然而觀察冷戰後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雖然它具備了一定力量與影響力，但卻不足以主導民眾的情緒，故無法實質地進入政策層面，從長遠來看，在國內外各項變動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很有可能持續造成中共內外治理的難度與挑戰¹³。

第三節 臺灣問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一、中國民族主義對臺灣問題的主張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北京成立，作為在全世界代表中國主權的存在，對中國大陸幅員廣闊的領土進行管轄，而曾經代表中國主權的國民政府，則退守到臺灣，兩岸隔海對峙，呈現分裂的局面，但由於雙

¹³ 任丙強，「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原因、特徵及其影響」，*學海*，第1期(2004年)，頁81~82。

方都堅持領土與主權不可分割，故此分裂並非指領土與主權的分割，而是表現在主權行使上的分裂，雙方對內只能對自身有效控制的領土進行管轄，對外均主張自己才是世界上唯一代表中國主權的合法政府，並且與承認自己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兩岸都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主張，仍以民族建構為自己的目標，差別在於雙方各自在政治上不同且對立的立場，正是有共同的民族主義基礎，雙方在民族主義的主張是一致的，均強調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主權與領土不可分割，中國一定要統一，而差別在於，統一是要在臺灣主張的三民主義下實現，還是中共主張的一國兩制下實現，以及誰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民族主義的一致性與政治、外交、軍事的零和性，是直到蔣經國先生 1988 年逝世前兩岸關係的模式，但中國民族主義對臺灣的主張，明確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分割的一部分，中國一定要統一這一點，始終沒有什麼變化¹⁴。

二、中國民族主義對北京涉臺政策影響

中國民族主義自冷戰後興起，始終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分割的一部分，中共是世上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兩岸終將回歸統一，故勢必對中共涉臺政策產生一定影響與壓力，主要表現在 4 個方面¹⁵：

第一，臺灣與大陸目前的分離狀態代表著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分離的中國」對中國民族主義有著深刻的影響，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中國人逐漸瞭解到到統一對國家的重要性，即使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時期，造成了國家的分裂與混亂，但各軍閥的目標至少在表面上都是為了國家的統一，因此割據一方是暫時性的，是為了積蓄力量統一國家。實際上，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統一和民族國家的完整性是同一件事情。

¹⁴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98~399。

¹⁵ 鄭永年，「大陸新民族主義對其臺灣政策的影響」，*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 4 期（2005 年），頁 23~25。

中國民族主義宗旨是「尋求富強」，最低限度是能夠避免「內亂外患」，「外患」是指來自外國的威脅與壓力，「內亂」不僅指內政的無政府狀態，而且更指國家的分離狀態，一個不能避免「內亂外患」的政府就沒有足夠的合法性基礎，顯然，對中國民族主義而言，臺灣問題不僅關係到國家的統一問題，而且也是關係到強政府的問題。

第二，臺灣問題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問題。臺灣人時常講述過往在與中國交往中所產生的「臺灣悲情」，然而，中國民族主義在與西方列強的交往中也存在類似的「中國悲情」，故臺灣問題並非僅僅是大陸與臺灣的關係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問題，具體來說，臺灣問題是中國受西方列強欺負的象徵，亦是中國積弱與羞辱的象徵，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只要大陸和臺灣仍然處於分裂，就證明西方的羞辱仍在持續，這種在歷史上形成的「中國悲情」構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心理成分，雖然中國民族主義追求的可能是一個理性的目標，然而實際上民族主義情緒本身就不是理性的，理性常常要讓位於情緒。

第三，臺灣問題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根源也在於中國正在崛起的事實。近年臺灣問題對於中國而言越趨迫切，除了臺灣本身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持續推動臺灣的獨立運動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本身的快速崛起，在中國歷史上，國家的分裂往往是發生在實力不振之際，故目前持續崛起的中國在理論上一定有能力阻止臺灣的獨立，同時，中國的崛起亦表明中國國際空間大幅擴張擴張，導致臺灣的國際空間日趨減少。

另外兩岸關係的特殊政治關係，雙方逐年激發者各自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中國正在崛起走向一個大國，不能對臺灣問題置之不顧，反而應該將統一問題提早，即使當前仍沒有能力實現統一，但也絕對不能讓臺灣正式地獨立再次蒙受恥辱，否則將導致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危機。

第四，臺灣問題正逐漸成為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而且越來越超過於政府的控制能力。任何中共領導人在臺灣問題上不可能完全自主決策，民族主義若沒有

人民的參與，代表國家的政府就沒有合法性，臺灣問題本身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但一旦政府不能自主地處理臺灣問題，民眾的參與成為必要時，將加劇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

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正在成為中共「保守」的臺灣政策的社會心理基礎。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得民眾很難接受臺灣離中國越來越遠的情況發生，故促使民眾要求中共使用一切手段來防止臺灣正式從中國獨立出去¹⁶。

三、中國民族主義對解決臺灣問題所能提供的空間

中國民族主義針對解決臺灣問題訂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也就是「一個中國」原則，即是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範圍的界定，對中國主權與領土不可分割原則的確定，對中國一定要統一的目標的確定，此為中國民族主義在解決臺灣問題上的具體體現。

從「一個中國」原則來看，是沒有任何空間接受或容忍臺灣獨立，或著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國民族主義主張中國主權與領土是不允許分割的，故臺獨將嚴重挑戰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主權與領土，而非屬於部分臺獨人士，絕對不允許臺獨人士用分裂國土的方式來達成他們的利益，這在國際上也是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簡言之，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絕對沒有主張臺獨的空間。

至於認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是不能接受的。所謂的國家是指一個擁有一定主權與領土範圍相聯繫的政治實體，既然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臺灣就不可能是一個「國家」，兩岸也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即使是用「特殊的」來形容，但只要主張兩岸是「國與國」關係，實質上就是要分割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導致臺灣實質獨立。在國際社會中，對中國的主權領土的承認是具有唯一性的，而臺灣的「中華民國」既缺乏國際社會的承認，也不被中國承認，故臺灣不具有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合法性，因此「國與國」關係不能

¹⁶ 同註 15。

成立。如果臺灣執意要以主權與領土的分割為條件，來追求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等於是向中國廣大民眾宣戰，最終只會導致戰爭而非和平發展，戰爭的結果雖然會付出一定成本，但終會讓兩岸再次統一。

因此，從中國民族主義的主張來看，兩岸要能夠雙贏只能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透過政治解決的方式來尋找解決分歧的方法，若不這樣，將只有零和而沒有雙贏。兩岸的和平是與兩岸都追求統一的目標不可分割的，若否定統一的目標，和平也就不存在¹⁷。

四、臺灣問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臺灣問題刺激著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自冷戰後臺灣在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上，逐漸將臺灣認同取代中國認同，用臺灣民族主義取代中國民族主義，用獨立的國家建構來脫離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民族建構的轉變，基此，海峽兩岸的紛爭，從原本在「一個中國」基礎上的兩種政治制度之爭，轉變成兩種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民族主義之爭與政治之爭混雜在一起的紛爭，加上美國對臺灣問題的介入，增加臺灣問題的複雜性與實現統一的困難度。即使如此，中國民族主義仍然堅持對國家統一的目標，尤其李登輝於 1995 年訪美以及 1999 年 7 月 9 日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後，激發了更加強烈地中國民族主義情感，表現出對分裂主義的同仇敵愾。

臺灣問題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在於，它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同時更加鞏固了將自己建設成為一個具備強大實力民族的決心，雖然中國民族主義已經體認到臺灣問題的複雜性，但其堅定國家統一的決心與毅力，讓中國民族主義即使犧牲流血也在所不惜，以達到讓中國成為實質的獨立國家，以及不再受西方列強欺侮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反對分裂、完成統一將成為牽動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動員民眾甚至流血犧牲的目標，只要臺灣持續朝臺獨、分

¹⁷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401~403。

裂的方向前進，中國民族主義將越趨高漲，不會消退，因為這是中國民族主義始終堅持的歷史任務。

簡言之，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現今，臺灣問題將強化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並對中共決策造成一定壓力，若無法滿足其需求，將嚴重打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臺灣未來若真走向獨立建國，中國民族主義將透過戰爭來確定疆土邊界的可能性將大幅提高，即使付出一定代價也在所不惜，仍不會猶豫去完成中國統一的歷史責任¹⁸。

第四節 小結

過往的中國民族主義多批判固有的傳統制度，認為必須打破傳統方能實現國家富強，而在冷戰後因為西方強勢主導國際秩序，對於崛起中的中國開始採取遏制措施，中國民族主義開始轉向鞏固傳統政治、文化制度，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以特有的「中國模式」對抗西方「中國威脅論」的進逼，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中國民族主義因為其情緒化的特點，時常造成失控的局勢，本文曾探討的「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提到，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中國民眾幾乎瘋狂失控，不但高喊著要美國等北約國家血債血還，甚至包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拼命丟擲物品與焚燒東西，讓美國大使及使館人員只能待在館裡，形同人質，中共雖然在事件處理上想冷處理解決，但國內民族主義的高漲卻不容許中共讓步，在無奈下，中共僅能採取系列政治手段，制約相關示威行為，並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最終讓反美示威運動順利落幕，解除了反美情緒可能失控進而挑戰中國政府的危機，然而整起事件卻凸顯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嚴重制約中共外交決策的空間。

因此，未來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勢必高漲，其情緒化、不受控、不確定性的問題將放大呈現，恐衍生為極端民族主義，迫使中共加大對內維穩力度，避

¹⁸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403~406。

免其強烈情緒最終挑戰政府權威，而對外則將因其強烈擴張性的特點，讓周遭國家深具恐懼，恐聯合起來孤立、遏止中國。此等因中國民族主義所引發的不利因素，將對中共內外治理造成嚴重挑戰。

另外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民族主義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允許臺灣實質獨立，然而在兩岸當前政治氛圍越趨不友善情況下，雙方分歧日趨激烈，恐難以單純政治解決的方式排除爭端，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臺灣似乎正逐漸朝向臺獨的路線發展，此將強化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並對中共決策造成一定壓力，在兩岸關係仍僵持情況下，未來發展不容樂觀。





第五章 結論

本章旨在總結前述討論，發現中國民族主義能發揮對內穩定調節功能，並不如西方學界所稱將激發內部激進情緒，進而顛覆中共政權甚至影響西方各國，而是將形成一種官民間的特殊默契。最後就中國民族主義對兩岸關係影響提出相關建議，期能對我政府兩岸政策帶來啟示。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針對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可以區分以下 4 點說明：

一、傳統中國盛行儒家文化，其蘊含的血統與家庭觀、地理觀、文化觀、政治大一統觀等 4 項價值觀，逐漸形成民族認同，用以區隔與外族的民族差異性，以及作為中華民族能夠存在的基礎，並不具備形成中國民族主義的條件。然而，隨著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開始大舉入侵中國，原有的民族認同已經無法確保中華民族能夠生存與發展，中國被迫開始追求國富民強，故在傳統中國民族認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中國救亡圖存、抵抗外侮以及進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最大動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案例為五四運動和冷戰後反美活動，前者是中國民眾相當不滿顛預守舊的清朝政府、割據紛爭的軍閥政府以及傳統中國文化，認為既有的政治、文化制度已不能保障國家生存與進行現代化建設，故要革命推翻舊政權且引進「德先生」、「賽先生」等新思維來取代的；後者則是中國遭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打壓與遏制，然而究責對象不再是當權政府，而是不滿當前被西方霸佔的國際體系，認為種種國際規則均嚴重制約中國的發展，故期待中共能團結內部，對外宣揚中國文化，共同抗衡西方強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使犧牲部分自由人權也在所不惜，逐漸成為可供中共進行政治操作的工具。

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是受到外在刺激而形成的，是對外部壓力的反彈，若西方國家對中國友善，中國民族主義將會較和緩，但西方國家若對中國不友善，透過種種打壓舉措遏制其崛起，則將激發中國民族主義，此正好可作為中共政治

操作工具，藉以轉移內部對執政當局的不滿，以團結內部抗衡外敵，建構大國形象，藉此更加鞏固政權合法性。

二、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整體國力雖大幅提升，然而卻面臨內部社會不穩、外部遭美國等西方國家打壓的不利局勢，增加中共社會治理與國際外交的困難性，故中共開始以民族主義為手段，透過其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試圖緩解、反制相關問題。

在案例中國駐南斯拉夫爆炸案中，中共一開始默許民眾進行反美遊行示威運動，甚至允許群眾包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向使館內丟擲物品或焚燒東西，以適時緩和與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之後乃透過系列政治手段，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最終反美示威運動順利落幕，中共也成功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地位，解除了反美情緒可能失控進而挑戰中國政府的危機。

在案例尼山聖源書院推動「鄉村儒學」活動中，由於儒家思想的維護社會穩定與維護國家統一的核心思想開始受到重視，故中共乃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與整合的新資源，其「鄉村儒學」的試點村落確實產生移風易俗的社會效用，村民瞭解了應有的禮儀規範與社會責任感，社會風氣大大改善，有效促進社會穩定與有序發展，同時也能讓政府推展工作更加順利，證明其對社會教化與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在案例成立「孔子學院」中，由於儒家思想蘊含的政治與文化意涵恰好符合中共領導層需要，中共乃開始運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對外建構大國形象的工具，用以抵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透由「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文化論述的攻訐行為，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效，逐漸反轉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上的不利局勢，消弭了國際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敵意，並能與西方文化抗衡，擴大了在國際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簡言之，中共運用中國民族主義發揮出鞏固政權合法性、維護社會穩定、建

構大國形象等三大功能，達到有效轉移內部政治壓力，團結抗敵之目的，對於吾人瞭解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具有重要參考。然而由於其不可預測性，已對中共治理造成嚴峻挑戰。

三、過往的中國民族主義多批判固有的傳統制度，認為必須打破傳統方能實現國家富強，而在冷戰後因為西方強勢主導國際秩序，對於崛起中的中國開始採取遏制措施，中國民族主義開始轉向鞏固傳統政治、文化制度，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以特有的「中國模式」對抗西方「中國威脅論」的進逼，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中國民族主義因為其情緒化的特點，時常造成失控的局勢，本文曾探討的「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爆炸案」提到，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中國民眾幾乎瘋狂失控，不但高喊著要美國等北約國家血債血還，甚至包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拼命丟擲物品與焚燒東西，讓美國大使及使館人員只能待在館裡，形同人質，中共雖然在事件處理上想冷處理解決，但國內民族主義的高漲卻不容許中共讓步，在無奈下，中共僅能採取系列政治手段，制約相關示威行為，並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說服中國民眾要緊隨共黨的領導，最終讓反美示威運動順利落幕，解除了反美情緒可能失控進而挑戰中國政府的危機，然而整起事件卻凸顯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嚴重制約中共外交決策的空間。

因此，未來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勢必高漲，其情緒化、不受控、不確定性的問題將放大呈現，恐衍生為極端民族主義，迫使中共加大對內維穩力度，避免其強烈情緒最終挑戰政府權威，而對外則將因其強烈擴張性的特點，讓周遭國家深具恐懼，恐聯合起來孤立、遏止中國。此等因中國民族主義所引發的不利因素，將對中共內外治理造成嚴峻挑戰。

另外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民族主義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允許臺灣實質獨立，然而在兩岸當前政治氛圍越趨不友善情況下，雙方分歧日趨激烈，恐難以單純政治解決的方式排除爭端，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臺灣似乎正逐漸朝向臺獨的路線發展，此將強化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並對中共決策造成

一定壓力，在兩岸關係仍僵持情況下，未來發展不容樂觀。

四、中國民族主義向來作為中共治理的工具，雖然其具有情緒化、不受控、不確定性的問題，但在中共適時參與和隨時監控下，多能讓相關事件發展朝向政府有利的方向，而非失控超出底線，能發揮對內穩定調節功能，並不如西方學界所稱將激發內部激進情緒，進而顛覆中共政權甚至影響西方各國，因此本文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將走適應中國國情的道路，持續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更新內容，卻又盡在中共掌握中，形成一種官民間的特殊默契。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隨著中國國力的進一步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勢必加大對其遏止力度，避免中國取而代之，改變西方已制定的國際規則，然不可避免將激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朝向極端化發展。臺灣或許受到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近年來在部分人士積極鼓吹下，臺灣社會已逐漸興起臺灣民族主義思潮，尤其年輕人對於中國認同感持續下滑，甚至無感、反感，已對臺灣政局造成一定影響，各政黨在兩岸政策上均難以忽視。因此，中國與臺灣因各自內部的民族主義壓力，未來在兩岸關係中或將不可避免採取較為本位主義的立場，輕則陷入僵局，兩岸官方「已讀不回」，民間大幅降低交流，重則發生爭端，破壞東亞甚至全世界的國際穩定與和平。

對此，雙方應積極透過學術二軌機制、民間交流、邀請他國居中協調等多元方式，儘快找出各自立場能接受的相處模式，形成一套互動機制，進行有效溝通與交流，以突破僵持的局面，避免最終使用激烈手段解決兩岸分歧，造成兩敗俱傷的後果，此重大挑戰考驗著雙方領導人的智慧與格局。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專書

大衛·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臺北：桂冠圖書，1992年，頁347~361。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頁32~33，61~65。

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等著，**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26~128。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308~309。

宗海仁，**朱鎔基在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頁59~88。

邱明正，**中華的智慧：中華文化的源泉，東方智慧的精髓**。臺北市：時報出版，2018年，頁15~16。

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新北市：韋伯文化，2009年，212~215，276~277，293~294，306~307，355~356。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1999年，頁138~156。

專書文章

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悖論—歷史的發展與政治的錯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認同與全球化**。香港：城市大學，2012年，頁80~82。

吳國光，「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五四時代與90年代的對比」，**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318~329。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問題」，**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391~393。

金觀濤，「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演變」，**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年，頁129~131。

洪泉湖，「民族主義基本概念的解釋」，**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1995

年，頁 3~6。

孫國棟，「民族主義與民族文化—兼談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頁 183~184。

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381~383。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436~437。

蕭功秦，「近代以來中國的高調民族主義」，**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認同與全球化**。香港：城市大學，2012 年，頁 64~67。

專書譯著

Ranjit Kumar 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 (*Research Methodology: A step-by-step Guide for Beginners*)。臺北：學富文化，2000 年，頁 129~130。

期刊論文

卜建華，「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探析」，**東嶽論叢**，第 4 期(2010 年)，頁 163~164。

文軍、朱士群，「社會分化與整合及其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影響」，**理論與現代化**，第 12 期(2000 年)，頁 21~22。

毛鋒，「論社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0 年)，頁 18~19。

王希恩，「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研究**，第 6 期(1995 年)，頁 16~17。

田麗虹，「改革開放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維繫—民族主義與合法性」，**共黨問題研究**，第 9 期(2002 年)，頁 23~24。

任丙強，「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原因、特徵及其影響」，**學海**，第 1 期(2004 年)，頁 78~82。

吳瑛，「對孔子學院中國文化傳播戰略的反思」，**學術論壇**，第 7 期(2009 年)，頁

140~141。

李樂，「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關係研究述評」，**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1 期(2010 年)，頁 55~56。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第 19 期(2014 年)，頁 191~192，217~218。

杭麗華，「鄉村文化生態建設：對鄉村儒學現象的思考」，**開發研究**，第 3 期(2015 年)，頁 27~30。

林泉忠，「中國民族主義的三階段論—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厲害了，我的國》」，**明報月刊**，第 53 卷第 9 期(2018 年)，頁 30~33。

金沖及，「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第 5 期(2001 年)，頁 1~2，13~16。

俞祖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類型、格局及主導價值」，**齊魯學刊**，第 2 期(2001 年)，頁 49~52。

段超，「當前影響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因素分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03 年)，頁 32~34。

唐建兵，「芻議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嬗變與走向」，**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 1 期(2010 年)，頁 40~41。

徐麗華，「孔子學院的發展現狀、問題及趨勢」，**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08 年)，頁 26~28。

袁婷婷，「民粹主義的中國境遇」，**探索**，第 1 期(2018 年)，頁 94~95。

馬傳松、朱橋，「階層固化、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重慶社會科學**，第 1 期(2012 年)，頁 36~37。

高峻，「五四運動起因新觀點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第 6 期(1997 年)，頁 66~67。

張健，「合法性與中國政治」，**戰略與管理**，第 5 期(2000 年)，頁 5~6。

張穎欣，「何謂『鄉村儒學』—以尼山聖源書院『鄉村儒學』教化實踐為例」，人

- 文天下，第 11 期(2014 年)，頁 18~19。
-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的緣起及主要特徵」，**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7 年)，頁 42~43。
- 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19 期(1993 年)，頁 28~29。
- 陳岳，「『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一種『層次分析』法的解讀」，**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 3 期(2005 年)，頁 93~96。
- 陳靜，「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探析」，**社會保障研究**，第 3 期(2010 年)，頁 96~97。
- 楊以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7 年)，頁 24~46。
- 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哲**，第 1 期(2004 年)，頁 10~12。
- 劉性仁，「中國大陸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概念性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93 期(2009 年)，頁 142~143。
- 鄭永年，「大陸新民族主義對其臺灣政策的影響」，**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 4 期(2005 年)，頁 23~25。
- 鄭師渠，「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歷史研究**，第 5 期(1995 年)，頁 95~96。
- 蕭功秦，「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與前景」，**戰略與管理**，第 2 期(1996 年)，頁 59~60。
- 蕭功秦，「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戰略與管理**，第 4 期(1994 年)，頁 23~24。
- 韓錦春、李毅夫，「漢文『民族』一詞的出現及其初期使用情況」，**民族研究**，第 2 期(1984 年)，頁 36~37。
- 魏建國，「中西傳統社會自然觀、血統觀及社會觀比較研究」，**綏化師專學報**，第 4 期(2000 年)，頁 118~119。

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第3期(1999年)，頁17~18，

龐景超，「當代中國鄉村儒學的訴求、收穫與瓶頸—以山東鄉村儒學為例」，*愛知論叢*，第103號(2017年)，頁60~61，66~67。

學術論文

李宗超，「近代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理性與非理性—以抵制外貨為中心」，*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頁16~32。

網際網路

「小莉看時事：生命對戰爭的疑問」，*鳳凰衛視*，1999年5月20日，

<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2040.html>。

「中美就中美就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的賠償問題達成協議」，*新華社*，1999

年12月16日，<http://news.sina.com.cn/china/1999-12-16/42554.html>。

「中國外交部向以美為首的北約提出最強烈抗議」，*新華社*，1999年5月8

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0889.html>。

「中國青年對美國愛恨交織」，*BBC 中文網*，2001年4月8日，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267000/12677141.stm。

「中國最強烈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新華社*，1999年5月8日，

<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0856.html>。

「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一年備忘錄」，*人民網*，1999年5月10日，

<http://news.sohu.com/20/11/news200731120.shtml>。

「尼山聖源書院簡介」，*尼山聖源書院官網*，<http://www.nssysy.com/a/syjj.html>。

「向三位英雄的新聞工作者致敬」，*人民日報*，1999年5月14日，<http://p8080->

data.people.com.cn.autorpa.lib.nccu.edu.tw/directLogin.do?target=101。

「克林頓總統與江澤民主席通電話再次就我駐南使館遭襲擊事道歉江澤民主席重申我政府嚴正立場」，*中國外交部*，2000年11月7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1368.shtml>。

- 「美中情局處理與中國駐南使館被炸有關的七名官員」，**新浪新聞中心**，1999年4月9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2000-4-9/80168.html>。
- 「美國領導人就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公開道歉」，**新華社**，1999年5月11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11165.html>。
- 「美總統特使來華報告美政府對襲擊中國駐南使館調查結果，中國政府指出美方迄今所作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並且強調美方必須作出令中國人民滿意的交待」，**人民日報**，1999年6月18日，<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kangyi/199906/18/61803.html>。
- 「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國青少年宮協會**，2010年12月21日，<http://www.cnypa.org/shhyzc/877278.jhtml>。
- 「愛國熱情融入到本職工作中，旅遊行業穩定客源確保遊客安全」，**人民日報**，1999年5月20日，<http://p8080-data.people.com.cn.utorpa.lib.nccu.edu.tw/directLogin.do?target=101>。
- 「凝聚在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下一由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引起的思考」，**人民日報**，1999年5月27日，<http://p8080-data.people.com.cn.utorpa.lib.nccu.edu.tw/directLogin.do?target=101>。
<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51372/51376/51493/3599646.html>。
http://www.cssn.cn/lx/lishixuezhuan/bwexljsm/lxzyjs/jzm/201801/t20180104_3804433.shtml。
- 江澤民，「在歡迎我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愛學術**，1999年5月13日，<https://www.static.ixueshu.com/document/df79d37cc467dbb9667c5ec9c4a63cc5318947a18e7f9386.html>。
- 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年1月4日，
- 呂岩松，「通訊：我親歷中國使館被炸」，**環球時報**，1999年5月9日，

<http://news.sina.com.cn/world/9905/050986.html>。

李鵬，「中國的發展和亞洲的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中國政協新聞網**，2005 年 9 月 4 日，

<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51372/51376/51493/3599646.html>。

柳河東，「鄉村文明重建與儒學復興系統工程」，**中國當代儒學網**，2015 年 3 月 10 日，<http://www.cccrx.org/ddrx/html/?7080.html>。

胡傳勝，「社會穩定的概念分析」，**思想的境界**，

<https://blog.boxun.com/sixiang/huchuansheng/05.html>。

張自慧，「以儒家元典思想涵養核心價值觀」，**人民網**，2014 年 9 月 29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29/c40531-25757423.html>。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愛思想**，2017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749-2.html>。

楊瀾，「楊瀾和朱穎家人一席談」，**文匯報**，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www.gmw.cn/03zhuanti/2004-00/jinian/jnzj/xzw/47.html>。

董峻、楊靜，「70 年，中國農民佔比少了五成」，**新華網**，2019 年 9 月 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03/c_1124954730.htm。

趙法生，「鄉村儒學的緣起與意義」，**儒家網**，2016 年 6 月 13 日，

<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8369>。

潘佔林，「回憶我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現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2017 年 10 月 21 日，

<http://fpag.fmprc.gov.cn/chn/wyzj2/shgc/t720083.htm>。

關於孔子學院/課堂，**孔子學院官網**，2020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關嶺，「從江澤民時代到習近平時代孔子加速走上神壇」，**多維新聞網**，2019 年 11 月 19 日，

<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57519/%E4%B>

B%8E%E6%B1%9F%E6%B3%BD%E6%B0%91%E6%97%B6%E4%BB%A3%E5%88%B0%E4%B9%A0%E8%BF%91%E5%B9%B3%E6%97%B6%E4%BB%A3%E5%AD%94%E5%AD%90%E5%8A%A0%E9%80%9F%E8%B5%B0%E4%B8%8A%E7%A5%9E%E5%9D%9B。

顏炳罡，「『鄉村儒學』的由來與鄉村文明重建」，中國孔子網，2020年1月9日，

http://www.chinakongzi.org/xsyj/xmcg/202001/t20200109_205246.htm。

蘇銳，「山東建成鄉村儒學講堂逾 9200 個」，新華網，2017年2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shuhua/2017-02/15/c_1120469314.htm。

